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81 期

2011 年 2 月 28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三

目 录

【译 文】

自下而上的分离主义——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

民族主义和地方的责任 埃莉斯·朱利亚诺(Elise Giuliano)著，罗秋实译

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从理论视角看高加索地区的冲突

斯万·E·科内尔 (Svante E. Cornell) 著，王剑莹译

主权的队列：检验苏联背景下的分离理论

亨利·黑尔 (Henry E. Hale) 著 胡萍萍译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译 文】

自下而上的分离主义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和地方的责任¹

埃莉斯·朱利亚诺 (Elise Giuliano) 著，罗秋实译²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联邦 (Russia) 面临着国家失败的危险处境。独立的要求从俄罗斯的族裔共和国不断向外扩展，像曾经在苏联发生过的那样，俄罗斯也面临着联邦内部族群分裂的威胁。在苏联时代晚期，俄罗斯的各共和国就已经开始从莫斯科取得权力。当苏联解体时，有几个共和国提出了更加激烈的要求，宣称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公然反抗联邦法律，并且设置共和国的总统的职位。一些共和国做出的联合抵制联邦选举并且停止支付联邦税收的决定，推动了一个似乎可能导致俄罗斯瓦解的过程。

发生在俄罗斯的这些事件，与东欧和苏联的事件一起，共同引发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试图廓清分离主义的原因及分离主义与族群冲突还有国家解体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分离主义在多族群的联邦国家中发展起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性结构生产出认同、行动者和资源，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族群动员同时弱化了中央国家。在这种视角下，族群联邦主义 (Ethnofederalism)³ 导致了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裂。⁴ 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与上述说法刚好相反，族群联邦主义减少了冲突并且有助于“保持和平”。⁵ 由于有一些俄罗斯的族群地区产生了分离主义，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却仍旧保持沉寂，因此考察俄罗斯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详细说明多族群联邦是否会产生并且如何产生地区性的分离主义。

这篇文章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分离主义会在俄罗斯产生？为什么特定的共和国比另外一些共和国表现出更强的分离倾向？这篇文章比较了俄罗斯下属的 16 个自治共和国，这些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族群-地域 (ethnoterritorial) 的行政等级结构中，地位仅次于加盟共和国。苏联领导人将自治共和国作为特定族群的居住地/“祖国” (homeland)，尽管在这些共和国内也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居住。与等级较低的自治州 (oblasts 苏联的行政区划名称) 和自治区 (okrugs 苏联的

¹ 原文英文题目为 “Secessionism from the Bottom Up: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o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刊载在 *World Politics*, Volume 58, Number 2 (January 2006), pp. 276-310.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Philip Reeder 普及了这一术语的应用，见 Re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⁴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vante E. Cornell, “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4 (January 2002); Carol Skalnik Leff,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Federations,” *World Politics* 51 (January 1999);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2 (Spring 1992); Roeder (fn.1); idem,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⁵ Nancy Bermeo, “The Import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 2 (2002);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nry Hale makes the more fine-grained argument that ethnofederal collapse is more likely when states contain a core ethnic region. See Hale, “Divided We St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thnofederal State Survival and Collapse,” *World Politics* 56 (January 2004).

行政区划名称)相比,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更像国家,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组织与信仰,宪法和一些族群性的语言教育。不仅如此,与等级较低的行政区域相比,自治共和国在联邦政府中被给予了更大的代表权,尽管这种权利是象征性的,并且自治共和国还被给予了有限的权利来决定地方的行政政策。¹为了保持权利、特权和制度性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的不变性,我只比较那些在1991年之前拥有自治共和国地位的地区。²除此之外,我集中考察自治共和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自治共和国像俄罗斯的州一样,在政治上比等级较低的行政区域更加重要。

后苏联的政治科学发展出了一种惯例化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之为“财富假设(wealth hypothesis)”,这一假设试图通过集中考察共和国的结构经济条件(structural economic conditions)来解释存在于俄罗斯的分离主义。依据这种解释路径,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会被他们共和国的财富所激发,向莫斯科提出了分离的要求。相反,相对贫穷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则缺少这样的激励。³这种主张表明了一种一般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结构性经济条件诱使行动者支持分离以获取经济利益。⁴财富假设的逻辑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并非所有富裕的共和国都是分离主义者,而有些贫穷的共和国则提出了脱离的要求。因此,财富这个变量,并不能解释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存在的分离主义。⁵不仅如此,由于仅仅集中注意力于经济结构,财富假设没有办法解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的政治转型是如何影响到莫斯科与共和国领导人及共和国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解释路径则试图将政治带回到关于共和国分离主义的研究中。

我主张,苏联高度集中的一党体系(single party)的解体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催生了一场政治控制权的争夺,而这一争夺则决定了共和国向莫斯科提出的分离要求的力度。在改革后期的大转型过程中,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们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对莫斯科负责,而是对当地的选民负责。民主化过程的三个关键方面促成了这一责任的转移。首先,苏联共产党(CPSU)的解体结束了党的特权体制(nomenklatura system),以前在这一体系下,地区领导人根据由莫斯科提出的

¹ 但是实际上,所有族裔地区的自治都是非常有限的。Ruth Lapidoth, *Autonomy: Flex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² 因此,我排除了1991年由自治州升格而来的那些共和国:阿地盖、戈尔尼-阿尔泰、哈卡斯和卡拉柴-切尔克斯。我也将印古什排除在外,它于1992年从车臣-印古什中分离出来。这些共和国很少表现出分离主义,因此他们对最初十六个共和国的分析没有影响。

³ 关于苏联共和国分离主义三个最为主要的比较研究是 Kisangani Emizet and Vicki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January 1995); Daniel S.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9 (January 1997); and Henry Hale, “The Parade of Sovereignties: Testing Theories of Secession in the Soviet Set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January 2000). 也见 Kathryn Stoner-Weiss, “Feder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Stephen White, Alex Pravda, and Zvi Gitelman,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9.

⁴ 这一逻辑最初由 Ernest Gellner, Donald Horowitz, Michael Hechter, Peter Gourevitch, 和 Tom Nairn 为我们勾勒出来。Gourevitch 和 Nairn 假设,在政治地位较为边缘的地区中,经济上相对发达的族裔精英会支持分离主义以发展他们地区的潜能。Horowitz and Hechter 从相反的立场主张,经济上的相对劣势会驱动族群性群体通过分离来增加他们地区的发展前景。见 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47–78; ide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83);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idem,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idem, “Group Formation and the 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no. 2 (1978); Peter Gourevitch, *Paris and the Provin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⁵ 使用相同的语气, Yoshiko Herrera 所做的关于俄罗斯主权运动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俄罗斯的非族裔地区中,地区性的财富差异并不构成主权运动的驱动力。相反,在特定的州里,经济利益是通过生产主权要求的方式被建构的。见 Herrera, *Imagined Economies: The Sources of Rus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党内名单来任命。第二，1990年举行共和国议会的首次半竞争性选举，将持有新观点的新代表们引入了曾经不经审查就得以成立的立法机构。第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使得非正式的组织得以出现并且允许使用诸如群众游行这样的底层策略。在一些特定的共和国中，那些最受欢迎的、最可见的和最能发出声音的组织变成了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运动，它们往往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但是时常被忽视的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变量。由此，自由化的上述三个方面一起，非常迅速地将俄罗斯的共和国由空洞的行政单元转变成为新的竞争性的政治角斗场，或者用卡罗尔·莱夫（Carol Leff）的话来说，转变成为“分离的且截然不同的政治市场¹”。

一旦我们认识到，上述处于核心地位的变化通过创造出一种地方控制权的竞争，重构了共和国领导人的动机，我们就有可能将下述论题理论化，这一问题关心次联邦的行动主体——拥有党内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导人、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公众等——如何影响共和国对于莫斯科的分离主义。由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公开化政策的推进，一些俄罗斯共和国中的大众观点开始支持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计划，它们要求获得与名义上的民族性相符的增长的权利，以及更大程度的共和国自治。²在那些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增加其影响的共和国中，集会活动中不断增加的人群以及在街道上或是地方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不断上升的地位这样一些明显的事实，表达出对现任领导集团一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们被迫从事民族主义的计划并且正式向莫斯科要求自治的权利。在另外一些共和国中，民族主义者取代了拥有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袖们并且亲自领导要求主权地位的运动。这些事态发生在那些对联邦的权威构成最大挑战的共和国内：鞑靼斯坦、图瓦、车臣以及巴什科尔托斯坦。³相反地，在那些民族主义运动未能取得支持的共和国内，现任领导者能够忽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同时能够免于被惩罚并保证自己职位的安全。

我主张，大众对民族主义的不同支持程度能够解释各共和国对莫斯科闹分离主义的不同水平。这一变量能够解释那些在财富假设下得不到说明的案例。虽然鞑靼斯坦、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这些分离主义共和国的资源确实相对丰富，但图瓦这个狭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核心的贫穷的共和国也存在分离主义这一事实，断然地否证了财富假设。同样，车臣的分离主义也无法在财富假设下得到解释。尽管车臣拥有一些原油和一条连接俄罗斯与位于巴库的精炼厂的输油管道，它也仅仅构成了1992年俄罗斯总产量的很小一部分，约1%；不仅如此，由于一个绕道这个共和国的输油管道项目正在进行，这些管道正面临着因多余而被放弃的威胁。⁴不管是从原料、人口规模、生活水平还是工业生产方面来进行测量，车臣和图瓦都属于俄罗斯最为贫困的地区，然而它们却位于最为激进的分离主义者之列。⁵还有，在科米，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存在并未激发分离主义，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共和国，拥有难以计数的煤矿和重要的油田和天然气田。财富假设既不能解释贫穷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也不能解释富裕国家中不存在分离主义⁶的事实表明，

¹ Leff (fn. 2), 210.

² Titular 这一术语是指其所在共和国以之命名的族群性群体，例如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

³ 除了当我们讨论1992年印古什分离以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时，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使用后苏联时期的名称以保持一致性。

⁴ Anatoly Khazanov,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219.

⁵ Oksana Genrikhovna Dmitrieva, *Regional'naia ekonomicheskaia diagnostika* (Regional economic diagnostics) (St. Petersburg: Izdatel'stvo Sankt-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 Ekonomiki i Finansov, 1992), 128-32.

⁶ 相似地，俄罗斯最富裕的族裔地区，包括坎替-曼斯克和亚马尔-涅涅茨这两个自治州，同样也未能提出分裂主义的要求。尽管作为州的这些地区与共和国相比只拥有更少的机构、权利和特殊待遇，它们却远为富裕，因为它们生产着俄罗斯80%的油气。Roy Bahl and Christine I. Wallich,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Richard M. Bird, Robert D. Ebel, and Christine I. Wallich, eds.,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Socialist St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5), 326. 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邦关系已经稳定之后，州的领导们要求从秋明省获得更多的行政独立，以对他们的自然资源保持更大的控制权。见“Khanty-Mansi Avtonomnyi Okrug,” in *Regiony Rossii: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Russia's regions: Statistical handbook) (Moscow: Goskomstat, 1999).

我们需要提出另外一个解释来理解共和国分离主义中的各种变化。我将表明，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只存在于有分离主义的共和国中，而不存在于那些没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

如果大众的民族主义在驱动共和国分离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话，那么它本身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现任领导人为了增强他们的共和国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时的地位而故意激发的呢？¹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意味着现任者在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的时刻依然能够自主地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耗尽了共产党的权力，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并且容许反对群体的形成，所有这些政策都损害了共和国内现任领导集团的自主性。不仅如此，认为共和国领导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大众投入到民族主义狂热中的观点，把精英们看作策略化的行动主体，而把大众看作被动的工具，他们要么：（1）是“真诚的”的民族主义者，在现实状态下耐心地等待机会，或是（2）苏维埃的从属者，忠实地听从他们的领袖的命令。² 这种解释路径简化了族群整个人口的情况，并且过高估计了族群性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基础的力量。相反，像俄罗斯非少数民族地区地区的公民一样，各共和国的居民们理性地采取行动，他们支持某个或另外一个政治家，并且偶尔才会转移或是取消他们的支持。

那么，社会大众支持民族主义的源由何在呢？在这篇文章提出的解释中，我将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苏联经济失败的过程中，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是如何使得由民族主义领袖明确阐释的特定议题与作为整体的族群之间产生共鸣。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族群成员不能充分地参与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因为在追求较好工作和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阻碍。他们强烈反对**命名族群**（*titular group*）³成员与俄罗斯人相比在社会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谴责歧视性的中央政府，认为惟有取得共和国的主权，才能够消除这些压制。然而，这些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与客观事实是相违背的，实际上，由于在族群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的官方政策的影响，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各共和国**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s*）在专业成就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者建构“族群间经济不平等”的做法依旧在民众中引起了共鸣，因为在一个异常不安全的环境中，这种观点为他们当前切身体会到的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提供了一个解释。通过使人们将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他们的社会认同即**族群性**联系起来，民族主义者将**族群性**政治化了。他们劝说人们相信，他们个人的生活机会依赖于他们**族群共同体**的政治命运。

这篇文章按照如下方式组织，第一部分通过引入对俄罗斯 16 个共和国分离主义的一种新的编码方式来界定因变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试图阐明：（1）共和国内部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的起源；（2）从 1898 到 1994 年间，共和国内分离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我用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mass nationalism*）起源的证据，建立在如下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对关于共和国劳动人口的族群构成资料的分析，然后是对民族主义者的宣言和在共和国内出版的报刊文章的话语分析。第三部分试图阐明大众民族主义影响了分离主义，使用相关数据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和共和国内分离主义、族群示威及族群暴力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关于三个共和国的案例研究将试图指出，图瓦和雅库特的大众民族主义在它们争取主权运动的关键时刻，影响了共和国对莫斯科提出的要求，而与此同时，马里埃尔较低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则在那里产生了相对较少的分离倾向。我将试图通过图瓦和雅库特这两个案例与马里埃尔的案例所做的比较，把作为自变量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变化范围最大化，因为前两个案例是俄罗斯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的代表，而后者则是俄罗斯低分离倾向共和国的典型。不仅如此，图瓦和雅库特的比较研究将会对财富假设提出质疑，因为这两个共和国在富裕程度方面存在

¹ 这一主张可以从以下文章中找到，Roeder (fn. 2); Treisman (fn. 6); and Jeff Kahn, *Federalism,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6–32.

² Dmitri Gorenburg的工作是一个例外。他向我们展示出地方机构如何在俄罗斯共和国之间的大众民族主义动员中产生影响，Gorenburg, *Minorit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ale指出，大众与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但是他认为宏观经济因素均一地影响共和国中的所有行动者。见 Hale (fn. 6).

³ “命名族群”即是以该族群为自治共和国命名的群体，如鞑靼人是鞑靼斯坦的“命名族群”（译者注）。

很大差别（图瓦很穷，而雅库特则相对富裕），但是它们却同样都存在分离主义的倾向。在第四部分我将提出主要的结论。

第一部分 俄罗斯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

为了刻画俄罗斯诸共和国中分离主义的不同水平，我使用了一个 14 级的编码指标（14-point coding index），这一指标以由共和国发起的行动及在 1989-1994 年间它们对莫斯科政策的回应为基础。我的编码体系抓住了共和国挑战莫斯科的主要方式，并且改进了之前往往依赖于一个单独的指标的编码系统，它们忽视了核心-边缘地区关系的关键变化与发展，并且对图瓦这一重要的案例进行了错误的编码。¹ 这些指标（在下文中讨论，并在表一中列出）表明，最具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是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²

在最早的分离行动中，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发表了主张其主权地位的声明，这些声明是紧跟着 1990 年 6 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重要的分离声明做出的（指标 1）。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戈尔巴乔夫试图继续苏联的存在并抑制叶利钦权力的增长，后一目的是试图通过给予自治共和国更多的权利甚至暗示在“复兴的联邦”内自治共和国将取得与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地位等手段来实现的。³ 叶利钦同样向自治共和国承诺了在俄罗斯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对它们更大的承认，他告诉它们，“你们能够掌控多大主权，你们就将获得多大的主权”。⁴ 尽管叶利钦做出了这些努力，在 1991 年 3 月举行的关于创造一个俄罗斯联邦（Russia）（read: Yelstin）的全民公决中，诸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的其他地区相比，都更少人投票支持这一决定。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和北奥赛梯甚至拒绝举行全民公决（指标 2）。⁵

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共和国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共和国开始零星地（scaled）支持分离主义的活动，另外一些共和国则趁中央政府虚弱之机，开始设置总统的职位（指标 3）、起草宪法及通过语言法（指标 4），其中一些共和国将它们命名族群的语言（titular language）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指标 5）。当叶利钦的休克疗法计划导致了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并减少了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的支持时，一些共和国开始截留税收收入和/或设立它们自己的税收政策。⁶ 以鞑靼斯坦、图瓦和车臣为例，它们“在 1993 年实际上停止上交他们的税收”，而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则常规化地延迟税收收入向莫斯科的移交（指标 6）。⁷

¹ 见 Emizet and Hesli's (fn. 6) use of the timing of Supreme Soviets' sovereignty declarations as a single indicator of secessionism (p. 500); and Treisman's (fn. 6) miscoding of Tuva (pp. 224–25).

² 主要的俄罗斯专家也将这些共和国视作最具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见 Valery Tishkov,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58; Leokadia Drobizheva, *Natsional'noe samosoznanie i natsionalizm v Rossiiskoi Federatsii nachala 1990-x godov*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early 1990s)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³ 因此，在 1991 年 3 月自治共和国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选区（82.6%）投票支持保留苏联。见 Edward Walker, *Dissolu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96, 102, 117; Vladimir Shlapentokh, Roman Levita, and Mikhail Loiberg, *From Submission to Rebellion: The Provinces versus the Center in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91; and Yuri Baturin, "Shakhmatnaia diplomatiia v Novo-Ogarevo," *Democratizatsia* 2 (Spring 1994).

⁴ E. Chernobrovkina, "Reshat' vam samim," *Vechernaia kazan* (August 10, 1990), 1.

⁵ Ann Sheehy, "The All-Union and RSFSR Referendums of March 17," *RFE/RL Research Report* 3 (March 29, 1991), 22. 1991 年 6 月总统选举的结果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叶利钦在自治区域中赢得了 50.6% 的选票，而在俄罗斯联邦（RSFSR）整体范围内获得了 58.4% 的支持。Walker (fn. 19), 117, 123–24.

⁶ Elizabeth Teagu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42; and Darrel Slider, "Federalism, Discord, and Accommod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Theodore Friedgut and Jeffrey Hahn, eds., *Local Power and Post-Soviet Polit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249.

⁷ 印古什和北奥赛梯宣告破产并且也减少了向莫斯科的税收支付水平；Shlapentokh, Levita, and Loiberg (fn. 19),

一场俄罗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之间的宪法危机和权力的争夺发展起来，促使叶利钦试图通过起草一部联邦协定（Federation Treaty）来保证诸共和国的支持，这一协定将成为新的俄罗斯宪法的一部分。这一联邦协定承认各共和国的主权并且保证族群性地域的特殊权利。尽管在 1992 年 3 月，大多数共和国在选举中通过了这一协定，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鞑靼斯坦和车臣却拒绝签署这一协定，而巴什科尔托斯坦则只是在莫斯科增加了一个确认其独立的附加条款之后才签署了这个协定。雅库特在谈判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种对立的姿态，直到达成了一项允许其从行政区域内钻石和黄金开采所需缴纳的税收收入中截留一部分的协议之后，雅库特才签署了协定（指标 7）。¹

表 1.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分离主义指数（1989-1994）

	Tatarstan	Tuva	Chechnya	Yakutia	Bashkortostan	Kalmykia	Karelia	Buryatia	N. Ossetia	Komi	Kabardino-Balkaria	Chuvashia	Udmurtia	Dagestan	Mari-El	Mordova
宣布主权地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联合抵制 1991 年俄联邦全民公决	1	1	1						1							
设置总统职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通过语言法	1	1		1				1				1				
名义上的主导民族语言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1														
设立自己的税收政策/停止支付税收	1	1	1	1	1				1							
拒绝签署 1992 年叶利钦的联邦协定	1		1													
举行关于主权地位的全民公决	1				1											
采用宪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是否在新的俄联邦宪法之前？	1	1		1												
1 是否包含了分离的权利？			1		1											
1 共和国法律的优先地位？	1	1	1	1	1	1	1	1								
1 联合抵制/非法化叶利钦 1993 年 4 月的全民公决	1		1													
1 联合抵制 1993 年 12 月俄联邦宪法的全民公决	1		1													
分离主义指数	12	10	9	8	6	4	4	4	4	3	3	3	2	2	2	1

大约与此同时，特定的共和国中发生了高度不稳定的行为。在鞑靼斯坦，在一次关于国家主

169. 也见 Jeremy Azrael and Emil Payi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Ethno-Political and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Russi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98), 29.

¹ Teague (fn. 22); Vera Tolz, "Thorny Road toward Federalism in Russia,"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December 3, 1993); and Kahn (fn. 15), 126-32.

权的全民公决中，61%的人口投票表示赞同，而许多人将这次全民公决理解为一次要求独立的投票。¹ 一年以后巴什科尔托斯坦举行了一次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激进的全民公决（指标 8）。在另外一系列挑战中，大多数共和国采用了自己的宪法（指标 9）。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和雅库特在 1993 年 11 月叶利钦组织的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进行的全民公投之前就通过了它们自己的宪法（指标 10）。²在图瓦的例子中，通过保证共和国法律对联邦法律的至高地位，及具体指定从联邦脱离的权力，我们看到了共和国宪法挑战莫斯科权威的最为大胆的例子（指标 11 和指标 12）³。

在 1993 年 4 月一次重要事件中，为了使反对改革的联邦立法机构非法化，叶利钦举行了一场关于他的领导地位和改革性政策的全国性全民公决。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投票支持叶利钦，但是在各共和国中支持情况大为不同，16 个共和国中有 6 个投票反对叶利钦。⁴ 鞑靼斯坦和车臣甚至拒绝在它们的地域内举行全民公投，公然否定了联邦的统治（指标 13）⁵。到 1993 年 9 月，共和国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依然握有主动权，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宪法危机正到达紧要关头，而叶利钦在此时轻率地通过了一个解散议会的法令。在长达两周的僵持期内，议会代表们拒绝离开位于莫斯科的议会大厦，而有几个共和国在此期间则或者谴责或者漠视叶利钦解散议会的法令。但是，大多数共和国缓和了它们的立场，它们追随叶利钦的激进决定，剥夺了议会的权力并逮捕反对者。绝大多数共和国遵从了叶利钦随后发布的举行新的地方议会选举的命令，但是鞑靼斯坦和车臣顽强地联合抵制了关于俄罗斯宪法的全国性全民公决（指标 14）。⁶

一些分析者相信，叶利钦解散议会的举动转移了俄罗斯陷入分裂的风险。不管这种信念是不是准确，从俄罗斯宪法的通过开始，这些举动确实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莫斯科决定和几个共和国签署双边协定。然而当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事件发生时，即使在最为坚定的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也已经开始消退。早至 1993 年，正如部分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民族主义运动正在逐渐失去支持。这些情况表明，次联邦政治竞争的不断衰退导致了相对于莫斯科的分离主义的水平的下降。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各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中分离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叶利钦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改变了俄罗斯整体的制度性环境，将权力从各共和国议会转移到行政机构，并且消除了大量中央政府的虚弱之处，这些虚弱之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曾使得各共和国可以挑战联邦的主权。

将指向莫斯科的分离行动进行编码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共和国自身是否想要独立或政治自治。一些观察者区分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要求，认为俄罗斯各共和国从始至终都仅只是寻求自治而已。他们准确地指出，只有车臣这一个共和国提出了明确的独立声明。但是，以此做出其他共

¹ 这一感觉在十天后鞑靼斯坦拒绝签署联邦协定时得到了强化。Ann Sheehy, "Tatarstan Asserts Its Sovereignty," *RFE/RL Research Report* 1, no. 203 (April 3, 1992), 1.

² 实际上，这4个共和国的行动使莫斯科相信，有必要用一部新的联邦宪法代替联邦协定；Tishkov (fn. 18), 62.

³ 大多数宪法宣称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同时给予俄语与族群语言官方语言的地位。见Teague (fn. 22), 43; Kahn (fn. 15), 82-84; and Gorenburg (fn. 16). 关于宪法的全文，见Iu. A. Dmitriev and E. L. Malakhova, *Konstitutsii respublik v sostave Rossiiskoi Federatsii* (Republican constitu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Izdatel'skaia Firma Manuscript, 1995).

⁴ 巴什科尔托斯坦、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埃尔、楚瓦什、摩尔多瓦和印古什投票反对叶利钦。在图瓦，大多数人在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上认同叶利钦，但是早些时候反对叶利钦的总统选举中投赞成票。Wendy Slater, "No Victors in the Russian Referendum,"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May 21, 1993). 但是，一场反对叶利钦的投票并不必然是对联邦的权威的挑战，因为一些共和国投票反对他是为了表明它们对最高苏维埃关于保留对地区补贴这一保守政策的支持。Ralph Clem and Peter Craumer, "The Geography of the April 25 (1993) Russian Referendum," *Post-Soviet Geography* 34 (October 1993).

⁵ 当鞑靼斯坦的行政部门阻碍选举，结果导致只有22.6%的选民参加选举从而使得选举结果无效时，车臣也联合抵制了这场全民公决。

⁶ 7个共和国投票支持这部宪法，5个共和国投票反对，还有2个共和国选民投票率低于50%。Gail W. Lapidus and Edward W. Walker,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Gail Lapidus, ed., *The New Russi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00-101. On local elections, see Elizabeth Teague, "North-South Divide: Yeltsin and Russia's Provincial Leaders,"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vember 26, 1993).

和国只是想要自治而非独立的结论，可能会犯一个错误，即通过观察到并未分离这一最终结果来推断那个时刻行动主体的意图。我认为，这种解释路径误解了分离运动的动态变化和政治本性。地区性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无法直接从他们的陈述和策略中发现，因为这些主观意图随着政治机会不断地转移和变化。

正如罗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所说，行动主体的“需求可以从自治转向独立，也有可能再转变回来，这取决于中央政权与分离主义者之间协商谈判的具体状况。”他主张，**脱离和分离**这些词汇应该不仅指独立运动，它也指称那些“寻求任何以领土来界定的政治变化，这些变化试图使一个族群在他们居住的地域内获得自主的控制权。”¹在俄罗斯的诸共和国中，温和的自治主张有可能转向更激进的要求，也有可能随着时间消散掉。因此，在分析分离主义时，地区性行动主体的意图不能按照如下方式推断：即假设没有脱离的结果可直接表明他们在前一段时期内的偏好倾向。²将**分离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将“为什么分离的需求会强化或减弱”的问题理论化。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应该被视作一个多元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变化发展的产物，而非一个一元行动主体固定的偏好。在俄罗斯的例子中，向莫斯科提出的分离要求是从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任领导人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在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一关系之前，我在下一部分将阐释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的源由。

第二部分 大众民族主义的源由

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在一个工作竞争不断加剧的正在衰退的经济中，由民族主义者明确阐释的特定议题与族群整体对丧失生活机会的恐惧产生了共鸣。民族主义者将这种状况归因于**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在寻求工作和资源的过程中受到了阻碍。族群成员被假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在从属于俄罗斯人的地位，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内被排除在对工业化经济生活的充分参与之外。民族主义者将这种严重的不公正归责于莫斯科的政策而非地方上的俄罗斯族成员。他们主张，成功地获得国家主权将会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状况。

荒谬的是，民族主义者关于族群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框架与**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不断增加的专业化和成就的现状是相矛盾的。在苏联时代初期，存在劳动力的族群分割，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在农村地区居住和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族成员的绝大部分在城市中从事更加需要熟练技能的工作。然而，苏联政府决定通过特殊的关于工业化、城市化、公共教育、俄国化和本地化的政策，来推进各**命名族群**的发展。**本地化**的政策保证**命名族群成员**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内享有在教育、经济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中更多的优先地位，并且通过将农村地区的居民移居到正在工业化的苏联城市中来使他们“无产阶级化”。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各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从这些配额政策中获益，他们从农场来到工厂，并且和俄罗斯族的成员一道获得工作。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各共和国**命名族群**的成员不仅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共产党内工作，同样也在经济管理部门中工作。因此，苏联的国家政策产生出了居住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族群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也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和他的家庭。

与此同时，作为发生在苏联的更大范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的一部分，生活在各共和国的

¹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April 1981), 168-69.

² 这个假设犯了追溯性的决定论（retrospective determinism）这一谬误。在这整篇文章中，我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 secession, separatism 和 autonomy campaign 这三个词。

³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Summer 1994), 433. See also Roeder (fn. 1); and Suny (fn. 2).

俄罗斯人口也逐渐迁移到城市。¹因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在绝大多数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与他们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尽管直到 1989 年，一些贫穷的共和国中依然存在着劳动力的族群分割，但是即使在这些共和国中，命名的**主导族群**的情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举例来说，在图瓦共和国，1989 年有同样数量的图瓦人和俄罗斯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学位，而在 1979 到 1989 年间的车臣共和国，车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俄罗斯人。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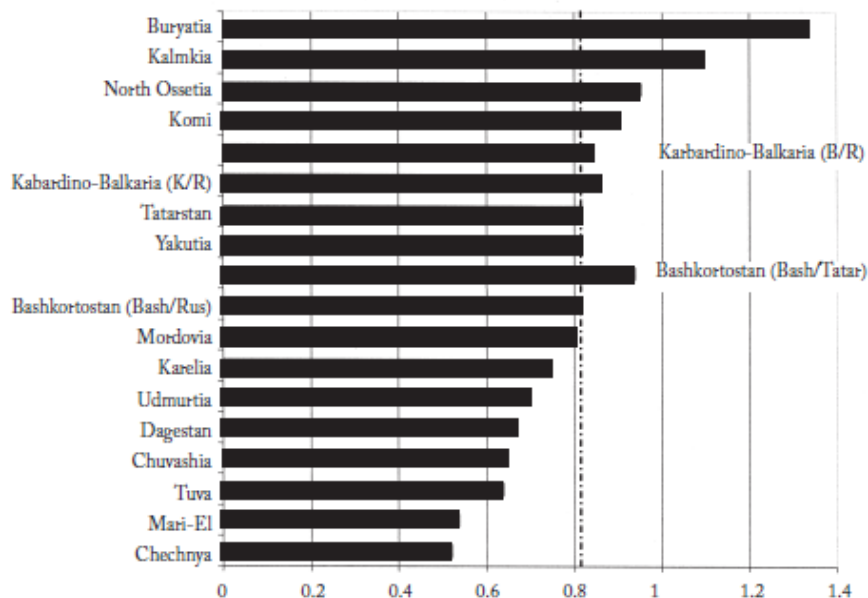


图 1. 白领劳动劳动人口中，命名族群与俄罗斯族代表性的比率

图 1 展示了这种巨大的社会流动，它表现的是，与每个共和国中各族群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在白领劳动人口中**命名族群**的成员与俄罗斯人的代表性的比率。³数值为 1 的比率表明的是，与他们在总劳动人口中的百分比相称，**命名族群**的成员与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拥有一样的代表性。数值大于 1 的比率则意味着，与俄罗斯人相比，**命名族群**的成员在白领工作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他们在共和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各群体在劳动力人口中整体代表性的比例的比率，数值小于 1 则表明，与俄罗斯人相比，**命名族群**的代表性低于应有水平。所有共和国的平均水平是 0.814（见图中虚线），这表明，在大多数共和国内，俄罗斯人在白领工作中的代表性只是稍稍不合比例地高于**命名族群**的成员。⁴正如可能预期的，**命名族群**的成员在共和国农村地区构成了白领工作人员的主体。但是，他们同样在令人羡慕的城市经济生活的高层集团中有很

¹ Moshe Lewin 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这些过程如何转变了整个苏联的民众。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² 对于雅库特共和国中的雅库特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G. S. Denisova, *Etnicheski faktor v politicheskoi zhizni Rossii 90-x godov* (The ethnic factor in Russia's political life during the 1990s) (Rostov-on-the-Don: Rostov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1996), 86–88. 也见 Leokadia Drobizheva, "Processes of Disintegration," in Vladimir Shlapentokh, Munir Sendich, and Emil Payin, eds.,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47.

³ 这些比率是由作者根据一些未出版的原始资料汇编的，这些资料由 Goskomstat，即苏联国家统计局委员会搜集，是 1988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一部分。见 *Professional'no-otraslevoi sostav intelligentsia naseleniia titul'noi i russkoi natsional'nostei absolymnie znacheniiia* (Titular and Russian ethnic group composition of white-collar economic sectors). 感谢 Dmitri Gorenburg 为我提供这些资料。

⁴ 仅仅只是在车臣和马里埃尔，俄罗斯人才在白领工作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车臣人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白领劳动人口中占 40%，在总劳动人口中占 54%，车臣人在共和国的总人口中占 55%。

好的代表性，同时与他们在几乎所有共和国总人口中的人数比例相比，他们作为企业主管的数量都与之持平甚至超出这一比例。¹（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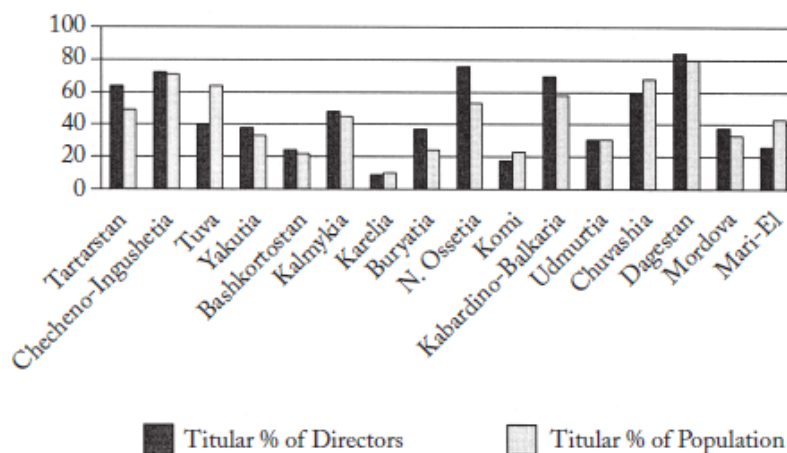


图 2. 命名族群在企业管理者中的百分比与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的比较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的宏观经济衰退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进一步激化了。大范围的消费品和食品短缺，加之在叶利钦取消价格控制之后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都使得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极为不稳定。这意味着，对白领工作的需求上升了，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却停止了增长。那些期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沿着熟悉的、国家设置的轨迹——中级教育之后是高等教育或技术训练，随之是安全的工作机会及沿着职业阶梯不断上升的前景——发展的人们，开始变得对国家是否还会继续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工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氛围中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竞争导致人们体验到了物质上的不满足和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是如果这种发展趋势影响到了所有的公民，为什么只有共和国内名义上的主导族群以支持民族主义对之做出回应呢？苏联的企业并不正式地按照族群界线来组织工作申请或采取集体工作的形式。²并且人们也有阶级、地域、专业、代际和国家认同，而不仅仅是族群认同。为什么他们将自己设想为沿着族群的边界进行竞争呢？

在特定的共和国内，人们之所以开始将他们自己是做一个族群-国家的（ethno-national）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在特定的时刻改变了族群认同的意义。民族主义者对在资源和工作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等问题的构建方式催生了一种群体感，这种群体感与特定的政治利益联结在一起。这些问题框架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民族主义者宣称，当俄罗斯人占据了城市中的特权位置时，命名族群却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最好教育的那些最好的工作被“给予”了俄罗斯人，迫使命名族群的成员处于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地位。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框架不仅忽略了苏联促进命名族群成员（titular）流动的国家政策，同时也将各共和国内命名族群刻画成被苏联及俄罗斯人所迫害的对象。通过宣称自身的受害者地位并谴责现在的国家体制，民族主义者由此能够主张，命名族群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的祖国内成为俄罗斯人的“从属者”，而这种情形背离了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张“政治的和民族的（national）单元应该是一致的”。³在由民族主义者阐发的种种问题中，那些关注阻碍族群经济平等的议题引发了最强烈的共

¹ 马里埃尔和图瓦是两个例外，尽管图瓦人在图瓦的管理人阶层中占了40%。见 *Narodnoe khoziaistvo RSFSR (The economy of the RSFSR)* (Moscow: Goskomstat, 1989).

² 根据族群竞争理论，由于群体开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环境中就资源展开竞争，尤其是当伴随着突然的宏观经济变革时，不断加剧的工作竞争可能会引发族群动员。Frede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Susan Olzak,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 Gellner (fn. 7, 1983), 1.

鸣，因为它们为面临不断增强的工作竞争的**命名族群**成员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解释。人们开始相信，由于他们在一个俄罗斯国家中保持了非俄罗斯的族群认同，他们的生活机会受到了限制，因而他们开始支持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即确立族群-民族的（ethno-national）国家主权。

对由民族主义者在（1）他们的成立宣言和（2）1989-1994年各共和国出版报刊文章中阐发问题所进行的比较性话语分析表明，关于族群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框架出现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这些有民族主义思潮的共和国中，而在其他共和国中，**命名族群**成员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失败了，摩尔多瓦和马里埃尔的例子表明了后者。¹我的分析考察了这一问题的三个维度：民族主义者如何将一种社会情境界定为“不公平的、无法忍受的并且应该得到改正的”；他们如何将不公平情形的责任归于一个行动主体或是一系列社会过程；还有就是，他们如何确定消除这些不公平的方法。²举例来说，一个雅库特的民族主义者将采矿业中雅库特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不平等描述为不公平，指责苏联政府给予俄罗斯人特权，最终把雅库特人获取国家主权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苏联……不但忽视了公民间的平等，更忽视了整个民族……不仅高收入和特权被给予了那些来采矿业工作的移民，包括北部的工资补贴、住房、最好的供应品。……仅仅在1961年，当向雅库特的本地居民发放工资补贴的时候，存在部分的平等。所有其他主要的特权都保留。……只有主权……能够调节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并防止这个共和国的本地居民中出现大量的贫困。³

相似地，民族主义组织**鞑靼公众中心**（Tatar Public Center）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宣称，由于处于从属于俄罗斯的地位，鞑靼民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它主张，从苏联时期的一开始直到今天，鞑靼人在农村地区的数量都超过了俄罗斯人，并且呈现出更为缓慢的城市化过程和“较低的专业资格水平”。这个组织于是据此提出了一些特定的解决方法，例如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控制“族群的构成”，帮助农村地区的鞑靼人在共和国的城市中取得工作，并且在经济生活中为鞑靼人提供保留的位置。⁴

因此，民族主义领导人并非通过简单地使用预先存在于族群中的态度偏好来吸引民众的支持，而是通过用**族群话语**来阐释经济问题的方式来积极地在民众中创造出怨恨。民族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仅仅表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自己恰恰就是他们试图破坏其权威的苏联政府政策的产物。他们集中关注关于专业流动、平等的族群代表性和个人进步的实际问题，正是重复了典型的苏联时代晚期的官方理念。民族主义者为了获得现代化的好处而坚持其共和国具有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时，并未看到他们所坚持的这些理念正是由苏联国家最初予以阐明的。像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只是使用了一系列现存的信念和实践来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提出，民族共同体应该实现其对国家的控制。⁵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对民族主义不断增加的大众支持并不意味着整个族群突然全部被民族主义者的主张说服。相反，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十分多样化，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缺乏兴趣甚至充满敌意。甚至在最具分离倾向的共和国中，大众的支持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是有差异的，与

¹ 通过在莫斯科两个图书馆中的工作，我从俄罗斯联邦这16个共和国中，从每一个共和国出版的至少两份报纸5年中的全部内容进行精选。我收集了4,100篇不同程度上关注族群政治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标准的新闻报道、政治领袖做的官方声明、社论、写给编辑的信以及民族主义杂志的声明。

² 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献认为这些维度是非常重要的。见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 和 David Snow and Robert Benford,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000).

³ V. Kopylov, “Kogo pugaet suverenitet?” *Yakutia* 14 (October 1992), 2.

⁴ Damir Iskhakov, *Sovremennie natsional'nie protsessy v respublike Tatarstan* (Current ethnic processes in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Kazan: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⁵ 这强调了John Breuilly的论点，他认为民族主义不是“预先存在的政治形式的民族价值和实践的表述”。见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69.

在许多前加盟共和国中的情形如出一辙。¹ 尽管俄罗斯各地的民族主义动员基本上具有暂时性的特征，事实依然是，呈现明显差异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在许多共和国中确实存在。尽管作为中央政权内部瓦解的结果，所有的共和国都面临着流变的和模糊的情境，但是只有某些共和国抓住这个机会向莫斯科提出真正的脱离要求。在分析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分离主义之前，我将首先在下文描述处于核心地位的民主化过程是如何摧毁垂直的责任体系并迫使共和国领导人们对地方的诉求做出回应。

第三部分 民主化、责任的转移和民族主义

在苏联时期，政治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垂直运作，因为莫斯科的共产党依据党的特权体制（*nomenklatura system*）任命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区域性的党领导在中央决定的基础上被任命或被解职。² 这些拥有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领导人在他们的共和国内控制了党和管理机构干部的任命。³ 但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一项策略，将权力从苏联共产党的手中逐渐转移到政府、特别是联盟的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手中。1988年他取消了党中央组织的权力，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取消了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这一条曾经确保了苏联共产党的垄断权力。⁴ 在1991年政变企图失败后，共产党所剩无几的合法性迅速枯竭，苏联的立法机构暂停了所有党的活动。两个月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正式取缔了共产党。⁵ 随着共产党的解体，苏联最主要的整合机制消失了，并打碎了地方领导人对中央的责任关系。

戈尔巴乔夫1990年举行半竞争性选举，以联邦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或最高苏维埃（前苏联最高立法机构）替代共产党特权体系（*nomenklatura*）的决定，同样损害了苏联的垂直责任体系。尽管在议会中拥有党内特权地位的（*nomenklatura*）人仍然占据了大多数席位，⁶但是独立的代表们现在开始在许多共和国中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些独立的代表们将一些几年前无法想象的新观点带到议会当中。竞争性选举将不经审查就被批准的苏维埃（委员会）转变成为由没有太多政治和行政经验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后者的合法性来自地区内的选举，而不是依赖于莫斯科的授意。⁷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政策还进一步使反对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反对群体可以公开阐述他们不合正统的观点，而不用担心会遭到国家的严厉压制。⁸ 赞成民主、保护环境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的群体出现了。在一些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支持基础仍然局限在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这一小群体中。但是在其他地方，民族主义的普及程度上升了，因为工人和党员也加入到教师、大学生和政府官员的行列中来。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出一大批的追随者。

¹ 见 Andrew Wilson's discussion of nationalism in Ukraine in Wilson, *The Ukrain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 Jeffrey Hahn, "Introduction: Analyzing Parliamentary Development in Russia," in Hahn, e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The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³ Olga V. Kryshтанovska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Nomenklatura into a New Russian Elit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37 (July–August 1996).

⁴ Kotkin (fn. 46), 75–85.

⁵ Stephen White, Graeme Gill, and Darrell Slider,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Shaping of a Post-Soviet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⁶ 只有在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诸国和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以及乌克兰部分地区中，独立的候选人才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赢得了有显著意义的席位数目。

⁷ 举例来说，在鞑靼斯坦，民族主义者在最高苏维埃中赢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并且通过将独立的代表争取过来，他们几乎控制了250张选票中的120张。见 I. V. Terent'eva, R.Iu. Beliaikov, and M.F. Safarov, *Politicheskie partii i dvizhenie Respubliki Tatarst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Tatarstan) (Kazan, 1999); and Gorenburg (fn. 16), 135. See also Gavin Helf and Jeffrey Hahn, "Old Dogs and New Tricks: Party Elites in the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of 1990," *Slavic Review* 51 (Fall 1992).

⁸ 见 Herrera 关于打破苏联限制(pp. 98–142)的讨论(fn. 8)。

被视作新选区的共和国领袖们开始抓住这一政治的主动权。通过在办公室观察在中心广场上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通过阅读地方报纸上激情洋溢的辩论，通过监控民族主义团体的活动，他们意识到了民众对民族主义支持的上升。被当作苏联既定秩序的主要支持者的他们，开始成为反对腐败和治理不当的有组织运动的攻击目标。举例来说，巴什科尔托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反对者发动了一场反对共和国共产党委员会的民众运动，并导致党委会的权力被解除。¹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试图取代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尽管这些举动并未取得成功，在全国性代表大会中提出的一些要求仍旧促使该国最高苏维埃对之做出回应。例如，当1990年在车臣全国代表大会（Cheche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立会议上通过了一个主张国家主权的决议时，车臣的最高苏维埃在几天之后做出了同样的决议。

最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组织在政府建筑物的前面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和布置警戒哨（picket），少数情况下还有绝食抗议，如此一来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举例来说，在1987到1994年间，鞑靼斯坦发生了142次民族主义示威，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1991年10月，一场要求独立的最为激进的集会持续了数天。当示威者听到消息说最高苏维埃已经投票否决了独立声明时，他们冲进了大厦。正如一位议会代表回忆的：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人群、那些多达数千人的的人群如何从早到晚包围着我们位于自由广场上的议会厅，他们如何将 Fauzia Bairamova（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领袖）偶像化，这位领袖宣布要从俄罗斯脱离出来。这太可怕了。我担心这类事件有可能令人担心地发展成为一场内战。我记得……当我们这些代表从议会出来的时候，保安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将人群挡住……人群向我们投掷玻璃碎片和钉子。²

这些行动引发了公众的讨论并得到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因为采取这些行动的示威者冒着被逮捕、失去工作甚至身体受伤的危险，表现出他们对理想的强烈承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民族主义者在特定的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和可资利用的资源。

对于那些不习惯考虑大众观点的特权体系中的党政（nomenklatura）领导人来说，行差踏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鞑靼斯坦的总统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Mintimir Shaimiev），在他支持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抑制信息传播并逮捕那些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变领袖的人之后，他学到了这一课。政变失败后，反对群体发动了一场民众运动来弹劾沙伊米耶夫。他最终得到了宽恕，因为民族主义团体认为，作为一个鞑靼人，沙伊米耶夫能够在根本问题上支持他们的利益。沙伊米耶夫于是宣布他支持共和国取得主权。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一开始实施，民族主义者就开始鼓吹这一主权地位。³作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党组织的官员，沙伊米耶夫一会儿支持保卫苏联的行动，一会儿又要求独立国家主权，这一事实使我们想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机会主义，正是这种政治机会主义在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产生出了分离主义。

各共和国领导人们甚至不能指望企业管理者来继续保持现状。工厂和矿山的管理者都有支持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共和国主权的经济驱动力，因为他们能够趁中央政府虚弱之机，增加他们对自己管理下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一些管理者已经开始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则在市场上出售在他们管理下的国有企业的产品。⁴一般而言，改革使企业管理者获

¹ 随后，几位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加入到共和国过渡性的领导集团中。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 8 (February 23, 1990); 及“Plenary Sessions Held,”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2, no. 6 (1990).

² Jeffrey Kahn 1997年6月在喀山对喀山州立大学法学教授 Boris Leonidovich Zheleznov 进行的访谈。相似地，the Union of Bashkir Youth 向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电视台行进并将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推迟总统选举的消息播出。RFE/RL Research Report 3, no. 47 (November 22, 1991).

³ 见 Elise Giuliano, “Who Determines the Self in the Poli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Ethnicity and Preference Formation in Tatarstan’s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32 (April 2000).

⁴ 这些从戈尔巴乔夫通过了1987年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之后开始。Eric Hanley, Natasha Yershova, and Richard Anderson, “Russia—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The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ssian Elites, 1983–1993,” *Theory and Society* 24 (October 1995).

益，因为改革使得他们不再需要遵守经济计划，也减少了莫斯科各部门对他们的监控。¹由共和国主权地位所提供的地方控制力的增长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些利益。这种自主权是在他们的共和国发起争取主权运动的直接结果。

除此之外，在特定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示范效应，扮演着对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领导人警示的角色。和他们自己民众一起，他们共同看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群众是如何将普选出来的格鲁吉亚总统胡尔季阿（Gansukhurdia）和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Mutalibov）强行赶下台的²。因此，当各共和国领导人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使用**族群关系动荡**这一威胁时，他们并不简单地只是为了增强他们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类行为所蕴含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族主义集会、密集的公众讨论和偶尔的暴力行为中得到典型表现的大众所持的观点，完全能够转过头来反对这些官员自身。与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客一样，各共和国的领导们希望能满足他们的选民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向莫斯科去要求主权地位的行为，是由他们自身的个人利益激发的。

一个替代性的假设是，影响分离主义的关键变量是共和国的现任领导集团是否在民族主义团体形成后迅速对他们进行压制或安抚，从而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赢得公众的支持并向地方领导人施加压力。但是当我们对不同的共和国进行比较时，我们并未在成功的压制/安抚与较弱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压制/安抚的缺失与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的流行之间发现相关关系。大多数共和国中党的领导阶层的变化是1989年人事改革、1990年苏联选举和1991年反戈尔巴乔夫政变的结果，所以，这种变化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压制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么做不感兴趣。举例说，楚瓦什的领导层由于民主的反腐败运动岌岌可危，同时也未能控制1990年的议会选举，并最终因为支持8月政变而被罢免。³这就为楚瓦什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吸引民众支持的机会，尽管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同样，在各共和国保持权力的保守派也并不一定压制或安抚民族主义运动。在马里埃尔，一个保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取代了一个保守的奥伯康（Obkom）领导人，但是民族主义团体马里联盟（Mari Ushem）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推出了一位总统候选人。除此之外，马里联盟（Mari Ushem）也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民众支持。⁴最后，在鞑靼斯坦，在权威集团早早便使用压制策略来削弱民族主义团体的影响时，民族主义团体依然能够赢得支持。简而言之，各共和国的领导层在这段时间内受到挑战，并且行政官员们未能控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⁵。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开始衰退的时候，各共和国的总统们开始能够漠视他们虚弱的反对者并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要求主权的运动

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一种是将民族主义候选人选进共和国的立法机构这类直接的方式，另一种是对关心自我保存的现任领导人施加压力这类间接的方式。我将提供两类证据来证明大众民族主义对共和国分离主义的影响。首先，我将表明，共和国中族群性示威的数量和族群性暴力的实例与共和国分离主义的水平或指标（表1）有相关关系。下面四个图刻画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关于图瓦和雅库特的个案研究证据向我们

¹ 正如之前的特权体系中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例如，石油公司 Tatneft 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结构重组并继续由鞑靼斯坦苏联时代的管理者进行控制。见 Leo McCann, “Embeddedness, Markets and the State: Observations from Tatarstan,” in McCann, ed., *Russian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及 Jozsef Borocz and Akos Rona-Tas, “Small Leap Forward: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Elites,” *Theory and Society* 24 (October 1995).

² White, Gill, and Slider (fn. 50), 103.

³ Gorenburg (fn. 16), 62–63, 72.

⁴ Timur Muzaev, *Etnicheskii separatizm v Rossii* (Ethnic separatism in Russia) (Moscow: Panorama Publishers, 1999), 159–63.

⁵ White, Gill, and Slider (fn. 50), 101.

表明，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增加了这些共和国向莫斯科提出的脱离要求，而来自马里埃尔的个案研究的证据指出，低水平的大众民族主义将那儿的分离主义保持在最小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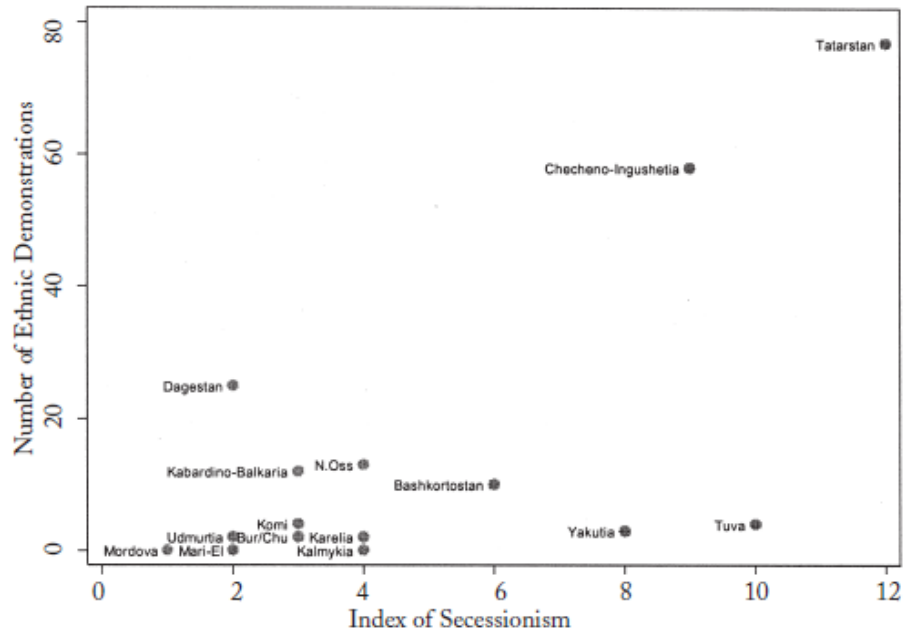


图 3.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示威活动的数量（纵坐标）与分离主义指数（横坐标）的关系

对族群性示威的参与刻画出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因为它表明采取有风险的行为去表达他们对当局权威的反对意愿。同样，一个人决定走到街上去，这是对他对其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公开宣称。¹ 在图 3 中，我们观察到在示威的数量和拥有最高分离主义得分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显著相关 ($0.661; p \leq 0.005$)。² 比如，最具分离倾向的鞑靼斯坦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分别有 77 和 58 次示威，而最不具有分离倾向的马里埃尔一次示威活动也没有。然而，在其他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很少有示威活动：巴什科尔托斯坦 (10)、图瓦 (4) 和雅库特 (3)。这种情形可以由以下事实进行解释，即一些民族主义团体选择在地方选举中提名候选人而非进行示威活动的策略。不仅如此，有些共和国的示威活动的数量在这个研究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代表，因为我在这里使用的数据集的采集时间截止到 1992 年，但是各共和国争取主权地位的运动却一直延续到 1994 年。

¹ 见 Mark Beissinger 关于民族主义事件意义的讨论；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28.

² 族群示威活动和族群暴力这两个变量是从 Mark Beissinger 关于苏联动员事件的数据集中得到的。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些资料。Beissinger 将族群示威活动定义为“人群的自愿聚集，这些人试图参加一项集体性的活动来展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赞同或反对”。所有的示威活动至少要有 100 个参与者。Beissinger 将一个大众暴力事件定义为“一次大众的政治行动，它最初的目的旨在通过袭击人群或是侵犯财产等形式造成暴力后果”。暴力事件至少要有 15 名参与者。这一数据集没有包含绝食抗议和一般的罢工活动。见 Codebook, “Non-Violent Demonstrations and Mass Violent Events in the Former USSR, 1987–1992,” 4, 6. 如果想要更多了解关于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见 Mark R. Beissinger, “Event Analysi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Acts of Disse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Protest* (Berlin: Sigma Press, 1998); Beissinger (fn. 63); 及 <http://www.polisci.wisc.edu/~beissinger/research.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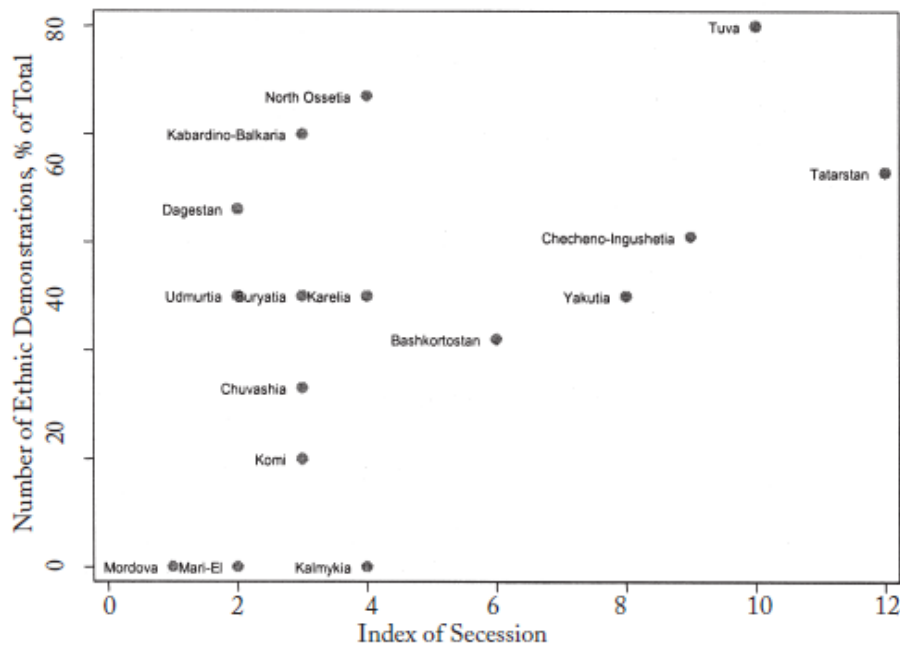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全部示威活动中族群性示威所占百分比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在苏联后期及后苏联时期的早期，许多群体围绕着各种议题举行了很多大众抗议活动。考察所有抗议示威活动中族群性示威的百分比，我们在图 4 中会看到，这个变量与该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也存在相关关系 ($0.518; p \leq 0.05$)。在具有高度脱离倾向的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中，大多数的示威活动 (60% 到 100%) 关注族群问题。在具有一般脱离倾向的雅库特和巴什科尔托斯坦中，40% 到 50% 的示威活动关注族群问题。我们注意到，三个北高加索的共和国达吉斯坦、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和北奥赛梯都只有很低水平的分离主义，但是却有为数不少的族群性示威活动。这一现象可由以下事实加以解释，这些共和国中的示威活动关注的都是族群-民族主权之外的问题。例如，在这些共和国中，被斯大林驱逐的族群群体的遣返和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南奥赛梯共和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主要的议题。¹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族群性的示威活动围绕着族内冲突和对邻近的阿布哈兹人和南奥赛梯人的同情展开，并未发展成为分离主义。在 1987-1992 年间，几个共和国经历了族群性暴力活动。尽管并非全部的共和国都是如此，在某些共和国中，这种暴力活动确实与争取主权的运动有关。正如在图 5 中所展示的，发生暴力的族群性事件最多的共和国是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车臣-印古什 (21)、鞑靼斯坦 (6)、图瓦 (7) 和雅库特 (2)。比较而言，具有较低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在这段时期内则没有发生族群性暴力活动。北奥赛梯由于 1992 年夏天发生在印古什人和奥赛梯人之间的暴力性冲突，再次成为上述陈述的一个例外情况；它与争取主权的运动没有关系。²因此，大量的暴力事件与分离主义在统计上是相关的，但是比族群性的示威活动与分离主义之间的相关程度要弱 ($0.438; p \leq .10$)。

¹ 达吉斯坦中 Akkinty 与相邻的族裔群体的不和谐、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中巴尔科里亚人对巴尔克尔人的挑战以及印古什人在北奥赛梯的 Prigorodnii 地区的宣称等都关涉到遣返这个问题。而关于区域性武装冲突的例子有，北奥赛梯通过接收奥赛梯难民并提供援助和志愿的战士，来支持南奥赛梯反对格鲁吉亚；还有巴尔克尔-巴尔科里亚站在阿布哈兹一边反对格鲁吉亚。见 Jane Omrod, "The North Caucasus: Confederation in Conflict,"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² Tomila Lankina 关于北奥赛梯的族群冲突与动员的讨论是 *Governing the Locals: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Russ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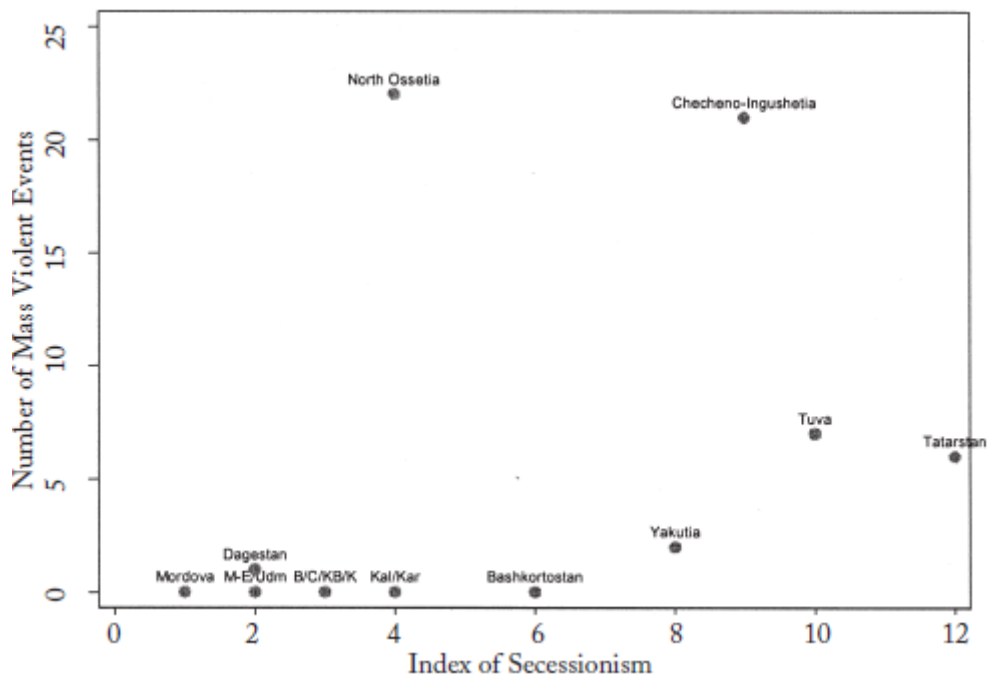


图 5.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族群性大众暴力事件的数量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注: 由于空间限制, 一些共和国的名称在图中被简化: M-E = Mari-El, Udm=Udmurtia, B=Buryatia, C=Chuvashia, KB=Kabardino-Balkaria, K=Komi, Kal= Kalmykia, Kar=Kare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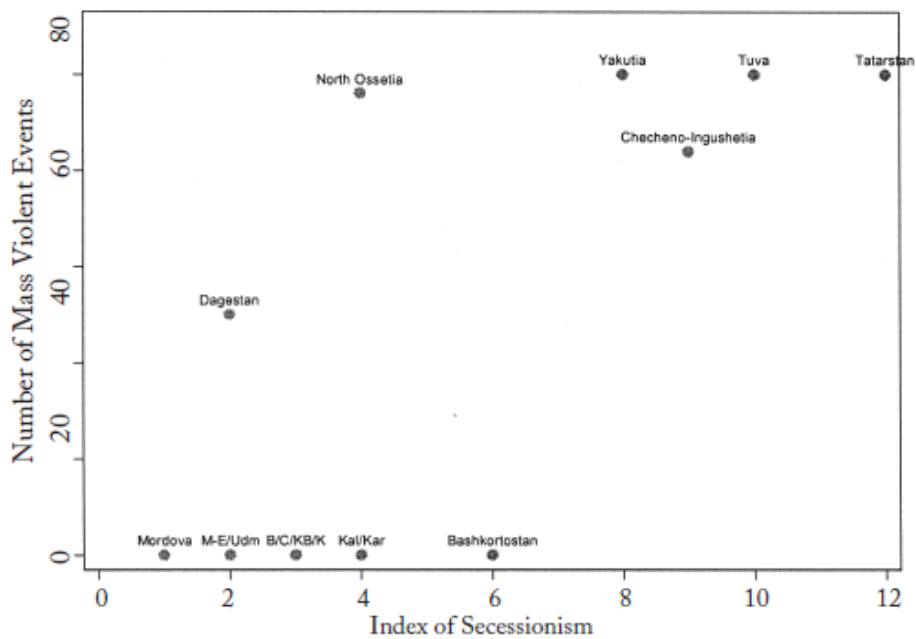


图 6. 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全部大众暴力事件中族群性大众暴力事件所占百分比与分离主义指数的关系
 (注: 由于空间限制, 一些共和国的名称在图中被简化: M-E = Mari-El, Udm=Udmurtia, B=Buryatia, C=Chuvashia, KB=Kabardino-Balkaria, K=Komi, Kal= Kalmykia, Kar=Karelia.)

如果我们考察所有发生过的大众暴力事件中族群性暴力事件的百分比,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变量与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并且统计上显著程度很高的相关关系 (.768; $p \leq .0005$)。

在鞑靼斯坦、图瓦、车臣-印古什和雅库特等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中，84%到100%的大众暴力事件都与族群性暴力有关（见图6）。达吉斯坦和北奥赛梯再次成为例外。

尽管示威活动和族群性暴力事件具有启发意义，他们作为大众民族主义的衡量指标仍旧是不完全的。个案研究的证据更加精确地为我们刻画出了在关键时刻，大众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各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接下来，我将比较三个在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方面存在差异的共和国：图瓦、雅库特和马里埃尔。图瓦和雅库特是这样一类共和国的典型代表，在这类共和国中，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向现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用民族主义的政策并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相反地，马里埃尔是另外一类共和国的典型，在这类共和国中，低水平的民族主义运动使现任领导人可以忽略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保有他们的职务。¹ 除此之外，图瓦与雅库特的比较进一步否证了财富假设，因此这两个共和国在财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却表现出相似的分离主义后果。分离主义在领土面积较小、经济不发达且资源贫瘠的图瓦共和国出现，同时也在面积较大且资源丰富的雅库特共和国出现。这一事实表明，财富这个变量在进行因果分析时所具有的解释力极为有限。最后，图瓦、雅库特和马里埃尔在大多数关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研究中都被忽视了，这些研究往往关注姿态鲜明的车臣和鞑靼斯坦，而忽视了民族主义运动水平较低的其他共和国。

图瓦共和国

图瓦是一个在1989年仅拥有309,000人口的西伯利亚小共和国，它的经济生产活动以传统的养殖羊、牛和马的畜牧业为主。它是一个具有高度分离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并且为本文的论点——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影响了共和国内争取主权地位的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² 首先，几位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在1990年和1993年被选入图瓦最高苏维埃，并且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取得了共和国中的最高职位——最高苏维埃的主席。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图瓦出现了水平极高的族群性暴力活动。第三，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影响了图瓦宪法的实质内容和采用，同样影响了反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投票活动。

随着1989年图瓦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 of Tuva）的形成，图瓦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人民阵线的领袖K. 毕尔岱（Kaadyr-ool Bicheldei）越来越受欢迎并且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人民代表议会（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中图瓦共和国的代表。³ 与此同时，图瓦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 of Tuva）的10名成员在1990年举行的第一次竞争性选举中赢得了图瓦最高苏维埃中的席位。当图瓦保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D. 安达尔（Ondar）在1991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支持密谋政变者时，公众对毕尔岱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一系列抗议示威和绝食抗议随之而来，导致安达尔（Ondar）被驱逐并为毕尔岱所替代。随着毕尔岱的任命，图瓦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取得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最高职位的唯一的共和国。⁴

在1990年的夏天，在俄罗斯人和图瓦人之间爆发了大量剧烈的暴力冲突。⁵ 在一个工业城镇的迪斯科舞场发生了一场年轻图瓦人与俄罗斯“公共秩序志愿者”之间的对抗，紧接着，一伙图瓦人在城镇中散开，到处损毁财产、恐吓公众并攻击警察。暴力活动蔓延到其他城市。在首都克

¹ 我使用多样案例方法（diverse-case method）和典型案例方法（typical-case method）来选择案例，根据的是 John Gerring 在他的下列著作中提出的类型学：《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² 莫斯科从图瓦这个俄罗斯最为贫穷的共和国切实拥有的金、铀、钴和煤等资源中侵占的份额少之又少。Zoya Anaibin, “Ethnic Relations in Tuva,” in Marjorie Balzer, ed., *Culture Incarn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³ Ann Sheehy, “Russians the Target of Interethnic Violence in Tuva,”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 37 (September 14, 1990).

⁴ 如一位俄罗斯分析家所言，图瓦大众战线由于大众的支持，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代表了一股真正的力量，Muzaev (fn. 61), 186–89.

⁵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暴力活动是否是图瓦人对图瓦人而不是族群间的。不过新闻媒介和一般民众将这些暴力活动认知为族群性暴力活动。Toomas Alatalu, “Tuva: A State Reawakens,” *Soviet Studies* 44, no. 5 (1992). 也见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From Ethnicity to Nationalism: Turmoil in the Russian Mini-Empire,” in James R. Millar and Sharon L. Wolchik, eds., *The Social Legac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孜勒，图瓦帮派的成员向几名俄罗斯人射击，据称是因为他们不会讲图瓦语。在另外一个城市，图瓦人焚烧并袭击俄罗斯人的住处，留下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城镇。¹ 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G. 希尔申 (Gregorii Shirshin)，一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员，试图使图瓦人民战线 (Popular Front of Tuva) 名誉受损，他指责是这个团体煽动了反俄罗斯人的集体迫害。毕尔岱强烈抗议这一指责，要求克勃格 (KBG) 为他们正名，但是为了平息人们的关注，他还是决定正式解散他的组织。

两个新的民族主义组织围绕着解体的人民战线 (Popular Front) 出现了：温和的主权图瓦民族党 (National Party of Sovereign Tuva (NPST)) 和激进的自由图瓦人民战线 (Peoples' Front Khostug Tuva)。两个团体均只由图瓦人组成，并且都以强化共和国的主权为其奋斗目标。自由图瓦人民战线的成员主要是从共和国的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的年轻的无业者，它从 1992 年开始组织集会。NPST 则主要由专业政客和知识分子成员组成，它组织成一个捍卫图瓦主权的政党。NPST 在图瓦全境设立机构，并在 1993 年的选举中积极活动以求进入由最高苏维埃转变而来的最高会议 (The Supreme Khural)。这个党派在图瓦人中不断增长的权威转化成选举的成功：它在大众选举中赢得了 62.9% 的选票，并获得了会议中为政党保留的五个席位中的三个。在这同一个选举中，NPST 的一个领导人物同时也是俄罗斯科学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图瓦分会的一位科学家阿拉克恰 (Kara-Kyz Dongakovy Arakchaa)，在俄罗斯杜马中获得了一个席位。

在 1993 年图瓦宪法的起草和采用过程中，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给共和国的政策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两个议题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成为公共讨论的核心：图瓦新宪法的问题与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脱离的权利。在一次全民公投之后，NPST 和自由图瓦都积极地为一项关于脱离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游说。² 脱离的议题在媒体和一般人群的“闲话家常 (kitchen conversation)”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相信，图瓦满足了由俄罗斯社会学家和人权倡导者 G. 斯达里多夫瓦塔夫 (Galina Starovoitova) 所阐明的关于脱离的三个必要条件：族群人口占大多数、国际性边界 (与蒙古) 以及过去的独立地位。³ 一位辩论期间其丈夫在图瓦议会服务的地方 (俄罗斯裔) 分析者指出，宪法的起草在民众中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到 1992 年，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同意宪法应该包含脱离的权利。

最高会议 (The Supreme Khural) 中的议员们注意到了公众的这一观点，并投票赞同一个关于脱离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莫斯科而言是一个警告，它表明，一旦图瓦的主权遭到侵犯，它将有可能选择脱离联邦。由于民族主义团体从一开始就已经为脱离的权利不断奔走呼号，他们将修正案的采纳当作他们运动的一个胜利。⁴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由民族主义者支持的修正案——对私人所有权的禁止法令——也在宪法中被采纳了，关于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的主张同样如此。

NPST 同样也致力于反对俄罗斯的联邦宪法。在 1993 年秋天它发起了反对实施这一宪法的示威活动。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当联邦宪法和图瓦宪法在同一天举行直接投票时，图瓦人口的大多数投票支持图瓦宪法 (53.9%) 同时反对联邦宪法。仅有 29.8% 图瓦人投票对联邦宪法表示赞同。⁵ 这些投票的结果表明，图瓦人支持关于脱离的修正案、对私人所有权的禁止法令及于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等民族主义政策。⁶

¹ 整体而言，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估计大约 10,000 俄罗斯人，包括高度熟练的工程师、教师和医生迁移出图瓦。Stefan Sullivan,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Tuv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8, no. 1 (1995).

² 自由图瓦更进一步，要求共和国立即举行一场关于从俄罗斯分离的全民公决；Drobizheva (fn. 18), 125.

³ 1989 年图瓦人与俄罗斯人在总人口中分别占 65% 和 32%。当它作为苏联的一个部分时，图瓦在 1921 到 1944 年间名义上是独立的。1921 年之前，它拥有俄罗斯保护国的地位。Balzer (fn. 71), 124.

⁴ Anaibin (fn. 68), 104, 110.

⁵ 这场民众选举发生在 1993 年 12 月 12 日。图瓦最高会议已经在这一年 10 月选举采用了图瓦宪法，当时叶利钦正忙于轰炸联邦议会。A. Kuzhuget and M. Tatarintseva, *Etn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Tyva*, Research Monograph, no. 74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9.

⁶ Ann Sheehy, "Tuva Adopts New Constitution," *RFE/RL Daily Report* no. 203 (October 26, 1993), 2.

尽管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对共和国政治造成了影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图瓦共和国的大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在衰退。¹这一结果与叶利钦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强化一起，开始将政治权力从毕尔岱领导的议会转移到行政机构。图瓦的新总统欧萨克（Ool Orzhak）通过为民族主义领袖提供政府职位将他们笼络住了。无论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图瓦的自治运动中，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民众中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且能够显著地影响共和国的政策。

雅库特共和国

雅库特是俄罗斯的另一个分离主义共和国，它向俄罗斯要求控制自己经济的权力，包括其境内自然资源的销售。依据常规化的思路，钻石、金矿和煤矿的存在激励了雅库特的领导人们提出分离的要求。²但是我认为，分离主义关键性的决定因子是对雅库特民族主义运动的大众支持的出现，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对共和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证据在于，首先，将民族主义候选人选入共和国的立法机构；第二，中等水平的民众运动，包括示威、罢工和偶尔的族群暴力；第三，围绕雅库特宪法的实施，公众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施加的压力。

雅库特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义团体是温和的庇护组织萨哈部落（Sakha Omuk，又称 the Sakha People）和更为激进的萨哈视角（Sakha Keskile，又称 Sakha Perspective）。萨哈视角为雅库特倡导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并积极地支持共和国取得主权。他的发起者语言学家 Lazar Afanas'ev，简洁地将他们的立场总结为：“反对掌权者的锋利（Sharp）政治”。1991 年政变期间这个团体对叶利钦的支持导致雅库特共产党组织将萨哈视角的成员从他们在省级共和国城市中的工作岗位开除，就是为了抑制这一团体不断增加的影响力。³温和的团体萨哈部落（Sakha Omuk）倡导萨哈（Sakha）民族文化的重生以及在共和国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最高层级中雅库特人更大的代表性；它同样也要求雅库特从他的自然资源中保留更大份额。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开始赢得大众支持。萨哈部落（Sakha Omuk）的几位候选人在雅库特全境被选入了地方苏维埃并在 1990 年被选入了最高苏维埃。尽管党的特权体系（nomenklatura）继续占据支配地位，雅库特民族主义者与最高苏维埃中的民主党人联手，在 1990 年宣称其共和国的主权地位。⁴萨哈部落（Sakha Omuk）为尼古拉耶夫（Mikhail Nikolaev）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进行游说。尼古拉耶夫是苏联时代的产品，他刚刚已经被选举为雅库特 1990 年重新组建的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当一年以后共和国总统作为最高职务被创造出来，尼古拉耶夫在普选中得到了大多数选票（76.7%）。民族主义者支持尼古拉耶夫是因为他支持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主权方面争取更大利益的主张，同时因为他是一个雅库特人，因而满足了雅库特总统必须能说雅库特语的要求。⁵

考虑到大众活动时，在雅库特有几起相互分离的族际暴力实例。M. 鲍尔泽（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指出，存在于雅库特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日常的族际紧张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几个时间点上容易爆发成暴力性冲突。⁶同时雅库特的煤矿、钻石矿和金矿工人们在苏联最后几年开始进行罢工。举例来说，1990 年，在大多数矿工都是新近的俄罗斯裔移民的米尔内

¹ 我在我书的原稿中讲述了这种大众民族主义衰退的现象。见Giuliano, “Why Secess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Russia.”

² 比如说见Daniel R. Kempton, “The Republic of Sakha (Yakutia): The Evolution of Centre- 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48 (June 1996).

³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A State within a State: The Sakha Republic (Yakut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⁴ 在宣称其主权地位之后，雅库特将它的名字改为萨哈共和国（雅库特）

⁵ F. M. Zykov, *Etn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Sakha do i posle vyborov 12 dekabria 1993 g.*, Research Monograph, no. 71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Khazanov (fn. 12) 写到，尼古拉耶夫“（在与叶利钦谈判的过程中）喜欢指出他是在萨哈部落的沉重压力之下采取行动的，并且，雅库特议会的一些决定是与他本人的意愿相违背的”（p. 183）。

⁶ Marjorie Mandelstam Balzer and Uliana Alekseevna Vinokurova, “Nationalism,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Federalism: The Case of the Sakha Republic (Yakutia),” *Europe-Asia Studies* 48 (January 1996).

(Mirny) 这个钻石开采城镇，一场短期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宣称从雅库特脱离并创建“勒那共和国 (Lena Republic)”。由于民族主义运动没有选择大众抗议集会作为行动的策略，发生在雅库特的示威活动的数量相对要少。但是，1992 年举行的一场示威表明，公众观点的强烈表达是如何在关键时刻影响共和国的政策，这一政策事件就是对雅库特宪法的投票。

到 1992 年春天，雅库特的议会和民众已经对是否需要采用一部宪法考虑了一段时间，雅库特采用宪法这一行动将有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间最早的此类行动。一般民众尤其是雅库特人积极参与到对这一行动的讨论中。有两个争论的主要问题：共和国的宪法应该在俄罗斯联邦宪法之前还是之后通过？是否应该纳入脱离的权力？当最高苏维埃于四月开始开会的时候，民众中对于宪法将被通过的期望已经出现。当议会明显倾向于让莫斯科先举行对联邦宪法的选举时，民族主义团体在议会厅前组织了一场大众游行，要求立即通过包含有保证脱离权力的修正案的共和国宪法。这场集会的参与程度很高，不仅有雅库特知识分子，也有来自民族主义学生组织 Eder Saas 年轻人。集会中的抗议者威胁到，如果不举行宪法投票，他们将会用最高苏维埃的副主席取代主席。¹

作为对这种压力的回应，议会马上举行了是否通过宪法的投票并采纳了关于脱离的有争议的条款。萨哈视角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促使最高苏维埃满足这一团体所要求的关于脱离的宪法性权利。然而，萨哈视角的另外一个要求，即雅库特民族被标识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的要求被否决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雅库特宪法的通过代表着各共和国中一起极其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紧张的全国性讨论持续了约一年半的时间。雅库特的宪法宣称该共和国法律拥有相对于联邦法律的优先地位，并且提供了脱离的权利。民族主义者将宪法的通过视作他们的胜利，并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公共节日 (vsyenyarodnaia)，人们在节日中庆祝久被期待的宪法的通过。²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普及程度开始衰退。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所享有的可观的民众支持使它得以影响了共和国的关键政策。

马里埃尔共和国

在马里埃尔的人口中，俄罗斯人与马里人大致相等，属于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中分离主义倾向最低的共和国之一。在 1990 年的主权声明之后，它的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主动性。举例来说，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未能通过一项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起草的语言法草案，并且直到 1997 年都未能采用一部新宪法。³ 马里埃尔有两个民族主义组织，它们都缺少公众的支持，这可以从极少的民众游行、没有族群性冲突以及民族主义者在选举上鲜少的胜利还有对共和国政策影响的缺失这些现象中看出来。

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祖居之地** (Kugeze Mlande, 又称 the Land of Ancestor) 主张从俄罗斯分离出来，倡导排外的移民法律。**祖居之地**引起争议的言论和集会为它吸引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它并不受大众欢迎并且从未在控制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取得成功。⁴温和的民族主义组织马里联盟

(Mari Ushem) 和其他共和国一样，支持共和国获得主权、要求马里语的国家地位、文化的复兴以及俄罗斯化的终止。但是，马里联盟没有选择使自己成为一种反对派势力，并从一开始就与地方领导人合作。

根据一位研究共和国政治的地方专家的说法，马里联盟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十分微弱，尽管大多数人尤其是马里人都很熟悉这个团体。⁵首先，马里联盟在共和国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支持了

¹ Drobizheva (fn. 18) 指出，这一威胁表明在雅库特人中存在一种非常激进的情绪，因为它可能意味着用族群性的俄罗斯来替代雅库特 (pp. 135–52)。

² 同上，137；也见 Muzaev (fn. 61), 206–10。

³ 马里埃尔于 1995 年通过了一部语言法。Iurii P. Shabaev,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Eastern Finnic Republics of Russia,”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of Eurasia* 37 (Fall 1998)。

⁴ Muzaev (fn. 61), 159–63; V. D. Sharov, *Etropoliticheskaia situatsiia v Respublike Marii El*, Research Monograph, no. 63 (Moscow: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5。

⁵ Sharov (fn. 87), 15。

落选的候选人。¹ 第二，1993年联邦杜马与马里埃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结果都证明了这个团体影响力的缺乏：只有一位马里联盟的成员获得了杜马席位，它的五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被选入最高苏维埃。而激进团体**祖居之地**没有赢得任何席位。

马里联盟主要的主动行为发生在1992年春天，它组织了一次“马里民族第一次议会（First Congress of the Mari nation）”。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要求马里人在政府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并且将马里人鉴别为“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中的民族性（National）少数群体”。但是马里议会依然是温和的，它反对脱离并支持叶利钦的联邦协定，这一协定将会成为俄罗斯宪法的一部分。在随后的秋天，共和国管理机构与民族主义者合作，它决定“将民族主义运动合法化为马里民族的民族代表组织”，这一组织通过了一些与之前在马里联盟的议会中相同的决议。尽管一些政府官员同时也是马里议会的领导人，另一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却向总统佐京（Zotin）发出了一个正式抗议，声称由这个议会通过的决议与先前存在的机构和法律相矛盾。作为回应，佐京将这个议会通过的决议印刷出版，与之一起出版的还有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指出这些决议仅仅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建议，并且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和这个团体有同样的倾向性。

1993年以后，马里联盟开始主要关注语言和教育问题。²从根本上而言，只有一小部分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支持了马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其成员们停止参与选举并向其他选区迁移时，这两个民族主义团体都显著减少了他们的活动。³

对案例研究的总结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图瓦和雅库特民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促进了他们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在那些未能提出分离要求的共和国，比如马里埃尔，大众民族主义明显缺失。因此，由大众做出的政治决定和这些决定对共和国内各种势力相互竞争的局面的影响，能够解释俄罗斯各共和国中分离主义的变化。

第四部分 结论

这篇文章提出，联邦内各区域中的政治状况影响了当地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文中已经表明，多族群的联邦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过程创造出了一些可能会鼓励区域分离主义的条件。具体而言，政治责任由中央政权向地方的转移转变了地方领导人的动机，迫使他们为保住自己职位而必须对地方的选民做出反应。如果这些选民希望自治，地方领导人就必须对这种愿望做出回应，制造分离主义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策略，它更是一个为了领导人自己政治生存的必要选择。民主化将行政区域变成了选举性的政治舞台。在俄罗斯，族群性的共和国变成了选举性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民众对民族主义的支持迫使地方领导人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因此，在联邦内对各区域政治控制的竞争是驱动区域性分离的重要变量。

这些发现对其他关心防止分离的文化多元社会（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出现的要求主权的不稳定运动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多族群的国家应当避免设立与社会承认的族群或宗教共同体相重合的次联邦地域结构。俄罗斯联邦诸共和国不同水平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共和国内最终的衰退都表明，分离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它依赖于次联邦区域内大众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强度。本文主张，大众民族主义既不是联邦各区域内的一种潜在态度，不是自然资源资产的简单函数，也不是一种被地方领导人操纵的被召唤出来的某种东西。同样地，注意力应该被导向理解在族群-联邦的国家中民众民族主义的起源，还有它在这些共和国中在精英权力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¹ Muzaev (fn. 61), 160–61.

² Ronald Wixman and Allen Frank, “The Middle Volga: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 in Bremmer and Taras (fn. 65).

³ Muzaev (fn. 61), 162

【译 文】

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 从理论视角看高加索地区的冲突¹

斯万·E·科内尔（Svante E. Cornell）著，王剑莹译²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种族政治冲突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一个焦点的来源，并于冷战后随着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南斯拉夫的冲突而达到高潮。在非洲和南亚的有明确种族界限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东欧、亚欧和西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也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³。人们修正并且最终放弃了关于种族冲突是历史残余这一主流假设，特别是种族冲突在欠发达地区的扩散。这导致了涉及种族问题的媒体封面关注度和公众意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种族冲突及其解决方案的学术研究也蓬勃发展⁴。

多种族国家中的少数族群的种族动员常常会导致自我管理（即区域自治）或彻底分裂的诉求⁵。特别是在一些以少数族群聚居情况来划定疆界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是可行的目标，而对领土的控制则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问题。在那些不同族群混居在相互重叠的居住区的情况下，上述诉求的可行性将会比较低，而且一些关于控制或影响中央政府的备受争议的议题也较少被提及⁶。实际上，费伦（Fearon）和莱廷（Laitin）发现，“地域性聚居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与都市中的或者分散居住的少数群体相比，聚居将更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种族暴力”⁷。

许多理论学者已经发现，包含有区域自治的方案在解决种族冲突时是十分有效的。例如，泰德·格尔（Ted Gurr）曾经指出，“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协商的区域自治制度被证明是医治

¹ 本文英文题目为“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刊载于 *World Politics*, Volume 54, Number 2, January 2002, pp. 245-276。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Ted Robert Gurr, “Ethnic Warfare on the Wane”, *Foreign Affairs* 79 (May–June 2000), 第 53 页。

⁴ 在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方面卓有成效的著作包括：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 (London: Verso, 1991);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Ted R.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Gurr, *Peoples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USIP Press, 2000)。

⁵ 然而，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种族诉求并非为了“脱离”——无论是关于自治还是关于分离——而是为了在居于国家核心地位的政府中更深程度的参与，特别是当种族之间的聚居地相互重合的情况下。

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而且冲突一旦发生，将很可能比混居程度较浅地区更为激烈严重。多族群混杂居的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将不会局限在该国的一部分领土及其从属部分的内部，而是会超出国家机构的控制，即整个国家领土范围都会受到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或者种族灭绝：划定地理分界线更加困难，冲突并非发生在双方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前线发生，而是发生在更为广阔的领土范围内的平民居住区。进一步而言，人们意识到明确划分领土边界是不可能的，这驱使他们排挤或清洗其他群体的成员，甚至认为这样做是必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方案，都意味着一个族群将会与其他族群继续混居，反过来这会被当作对自身族群安全的一种威胁，进而又促使人们对其他族群成员进行排挤或清洗，而排挤或清洗其他族群成员的行为甚至被视为是为了我群利益而采取的不可或缺的防御性策略。这种情况称之为“安全困局”，参见 Barry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no. 1 (1993)

⁷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Weak States, Rough Terrain, and Large-Scale Ethnic Violence since 194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September 2–5, 1999), 16, emphasis in original..

分裂主义引发的种族政治战争的富有成效的解药”¹。相似地，诺德奎斯特（Kjell-Åke Nordquist）观察到，建立一个自治政权——“一个自我管理的完整国家地区——即一个化解内部武装冲突的机制，对处于这种冲突中的政党来说，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选择，更是一个实际上的选择”²。区域自治暗示着“种族领土”（即把种族与领土相关联）这个概念的引入。一旦一个特定地区被某族群视为他们的祖国、或者一个少数族群占据了该自治国家结构内人口的大多数并且产生了族群认同，那么“种族领土”就可能形成。

基于某些原因，中央政府普遍地对自治权诉求表示犹豫不决。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授予少数族群区域自治会成为最终导致地区分离主义的第一步；其次，授予一个地区以自治权可能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个人或群体的歧视³；第三，自治提高了与特定少数人群有关的外国军队入侵的风险⁴。此外，越来越多关于领土的种族政治冲突已经通过包括区域自治在内的妥协方案得到解决，例如这样一些地区的自治条款：1980年西班牙的巴斯克人（Basques）、1990年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人（Miskitos），1972年印度的那加人（Nagas），以及197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Afars）。毫无疑问，自治之所以成为普遍的解决方式，是因为当某特定地区出现行政管辖权的冲突时，自治是可以使用的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小程度的妥协。确实，如下面将要进一步探讨的那样，自治代表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一种妥协。

种族联邦主义的倡导者呼吁自治方案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机制，进一步的多族群国家的联邦制有助于防止种族冲突。在一些文本中，种族联邦主义对种族关系紧张的作用被描述为具有戴维·迈耶（David Meyer）所说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特质⁵。然而，还有不容忽视的原因把矛头直指这样一个问题：区域自治制度也可能并非有利于种族内部的和平与合作，而是促成族群动员、提升分裂意识甚至武装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文本中，关于联邦主义的优点以及被广泛传颂，但90年代以来引发了“种族联邦方案是否能够有效阻止种族冲突”的疑问。一些研究者指出——通常顺便提及——在特殊条件下，联邦结构如何产生可能的不良后果⁶。至今还没有人开展系统调查来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原本为减弱离心力而设计的联邦建构反倒增强了离心倾向，这是为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

本文勾画了一个用来解释为什么种族联邦建构、特别是区域自治可能会引发而不是抑制冲突的初步的理论框架。首先我们呈现了与区域自治相的合乎逻辑的案例，其次本文分析了特定的南高加索地区的情况，特别是在1991年以后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发展。格鲁吉亚包括了五个聚居的少数族群，其中三个是独立自治的，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不同社会地位少数族群发展的机会。进一步而言，由于格鲁吉亚领土范围有限，中央方面的政治发展及其在地方上对少数族

¹ Ted Robert Gurr, “Peoples against States: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and the Changing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 (Fall 1994), 第366页

² Kjell-Åke Nordquist, “Autonomy as a Conflict-Solving Mechanism: An Overview,” in Markku Suksi, ed., *Autonom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Hague: Kluwer, 1998), 第59页。

³ 有趣的是，在一些特定的案例中，中央政府，特别是在那些试图建立一个公民国家认同的国家中，中央政府认为授予一个少数族群以自治权实际上是把这个族群的成员划定为二等公民。以土耳其政府为例，该政府拒绝给予具有库尔德血统的公民特殊权利，因为这些公民已经享有了土耳其共和国头等公民现有的所有权利，而任何特殊的权利都将意味着他们脱离其他居民，从而沦为二等公民。

⁴ 参见 Ruth Lapidot, *Autonomy: Flex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onflict* (Washington, D.C.: USIP Press, 1996), 第203页。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认为，拒绝授予自治权可能会成为与这个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国家进行干预的强烈激励。

⁵ David J. Meyer, “A Place of Our Own: Does the Ethnicization of Territorial Control Create Incentives for Elites to Conduct Ethno-Political Mobilization? Cases from the Caucas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2000). 参见 Daniel J. Elazar, *Federalism and the Way to Peace* (Kingston: Queens University, 1994); also Lapidot (fn. 9).

⁶ 参见 Henry Hale, “Ethnofederalism and Theories of Secession: Getting More from the Soviet Ca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1999); Robert Dorff, “Federalism in Eastern Europe: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Part of the Problem?”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4

群的影响这两者十分相像。而在可相似的跨国语境下，这五个案例也具有可比性。

一. “自治”的理论视角

许多学者已经把三个共产主义联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崩溃归因于他们的种族联邦特质¹。在这三个国家的每一个例子中，中央国家结构的衰落和它的最终解体都与那些族群明确的加盟共和国内握有实权的民族精英所推行的分离政策有关。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随着联邦体系的进程所生成的关于民族重建的诉求是国家解体的一个起点；在前苏联时期，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本身的分裂趋势显著地促成了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然而，关于联邦主义以及种族政治冲突的研究尚未在一个较低的行政级别（即在自治区域）上展开。事实上，南斯拉夫和苏联都是联邦制国家，他们的加盟共和国立根植于平等的基础，而且所建立的仅仅是非领土、非种族的联邦中央。这种联邦中央通过国家公民意识形态认同而获得合法性（虽然在关于苏联是否由俄罗斯主导、南斯拉夫是否由塞尔维亚人主导这个问题上仍存有争议，但是这个论断的可信度已经受到了挑战。毕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而铁托是克罗地亚人）。各个自治地区的情况也大相径庭。由于一个或几个获得自治权的明确的少数族群地区试图把他们自己从完整的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就越来越依赖于一个非自治地区的种族和领土基础，实际上意味着中央政府更加依赖于这个国家里的多数族群。

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自治指的是社会机构“通过实施法律法规来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在国际法中，自治意味着“国家部分领土辖区有权通过实施法律条款来治理自己的事务，但不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²。在这里，区域自治指的是授予某个族群自我统治——即在一个特定领土范围内行使政治自主管理权——以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然而，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是为了使特定的种群的成员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能够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制定的方案，这也被用于特定国家内的宗教群体，例如在以色列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印度的穆斯林。特殊群体里的成员也可以获得保留他们的语言文化的特权，这通常是通过为少数族群建立本族母语学校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文化自治并不以领土为基础，它要么基于个人，要么基于群体；要么基于自愿原则，要么基于强制力³。区域自治和文化自治两种模式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特定国家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它也是该国政府的国家体系的一部分⁴。广义而言，自治可以被定义为“授予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的人们以内部自我管理的权力，由此独立于民族国家或中央政府影响之外行使部分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取决于“自治实体在它的政治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和形式上的独立程度”⁵。区域自治通常被认为是联合国宪章里“自我管辖”的同义词，即独立于主权，因此避免了与国家领土完整的自发性冲突⁶。文化自治并没有那些区域自治所预示的含混不清又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后果：在文化冲突中，领土和种族并没有联系在一起，

(Spring 1994).

¹ 参见,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对该问题最近的研究参见 Carol Skalnik Leff,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Federations,” *World Politics* 51 (January 1999).

² Hans-Joachim Heintze, “On the Legal Understanding of Autonomy,” in Suksi (fn. 7), 第7页.

³ Henry J. Steiner, “Ideals and Counter-Ideals in the Struggle over Autonomy Regimes for Minorities,” *Notre Dame Law Review* 66 (1991年), 第1542页.

⁴ 同上, 第1542页.

⁵ Heintze (fn. 13), 第7页.

⁶ 参见U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Documents of the U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 (New York, 1945), 第296页, cited in Heintze (fn. 13), 第9页.

也没有明确的类似国家制度的机构。所以，除非另外加以明确定义，本文所用的“自治”指的是“区域自治”。

1. 文献中的自治政体：利弊双刃剑

相对而言，关于自治政权的优点已经被广为传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种族，因此自治制度的倡导者呼吁，为了避免额外滋长出数以百计的新国家，族群权力的认可需要放置在一个低于国家的层次上。次国家实体（例如种族、民族或宗教群体）和超国家实体（如跨区和跨国组织等）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却相对削弱，国际体系的传统结构受到了威胁。基本上，自治是用以平衡国家和群体的领土利益之间的冲突的唯一可能做出的妥协。此外，“自治”这个概念本身固有的灵活性使得它可能被不断调整以适应于在各个特定情境下缓和种族紧张，因此自治的作用可能仅仅是暂时防止、也可能是彻底解决种族冲突。

以保存多样性为基础而建立的自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假设，即差异性和他们的制度化将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危及这个世界。正如斯坦纳（Steiner）所说的，“伴随着西方发展生成了单极化趋势，在与此进行对抗的相互作用中，少数民族的自治统治捍卫了文化生存权”¹。事实上，国际体系日益朝着一个以“通过给国家施加压力来为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为规范的体系迈进。但在，这种规范/标准引发了明显而严峻的问题：“人权运动中维持差异性的理想模型不能被想当然地用来支持自治政体的建立。”²由于这样的政体建立在对各个自治区平等保护的原则上，因此自治议程暗含了制度分裂形式，它破坏了平等原则，而这种原则“明确区分了以宗教、语言、种族或者民族起源为基础的群体并且翔实解析了社会经济生活及事业与种族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此外，自治权不仅仅是保留而且也固化了群体之间历史上的差异；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一个由彼此分离的自治政权组成的国家更像是一个陈列着社会文化古董的博物馆，而不是任何人权理想国”³。

另外有一些学者指出，自治权包含了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特殊待遇，这可能会引起其他群体的抗议，并由此导致冲突，而不是先前所认为的将会防止冲突⁴。相反地，一个单一制国家通过整合——以赋予个体公民权全部尊重而不是赋予集体权利的机制——来为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同样的规则，无论肤色、种族与宗教。由此，单一制国家避免了围绕着由自治制度或联邦制度而产生对立。自治在实际上可能会孤立少数民族并阻碍该族群成员在更大的国家范畴内的政治参与或经济参与。因此，它使得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变得困难重重，使该族群疏离其他群体，最终导致了分裂⁵。莱克（Lyck）关于丹麦法罗（Faroe）群岛自治制度的分析表明了自治的一个消极影响——它使得国家对该地区的发展所承担的责任有所削弱⁶。这部著作的总体基调认为自治的优势远远大于它可能会有的弊端。但是，只有在自治权的设计、创建和维持的过程中同时也能够提供机制来保证对未来可能的冲突的管理、甚至最终改变自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自治并非自发的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地，它是一种会带来数不尽的风险乃至危险的不完美的解决方式。

2. 自治权与主权

就其本质而言，区域自治是有助于分裂主义的。无论公民群体是以种族、宗教还是意识形态为标准组织起来的，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与一个自治区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横向

¹ Steiner (fn. 14), 第 1550 页.

² 同上

³ 同上, 第 1552 页

⁴ 参见 Douglas Sanders, "Collective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3 (August 1991).

⁵ 参见 M. Brems, *Die Politische Integration Etnischer Minderheite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5), 第142页.

⁶ L. Lyck, "Lessons to be Learned on Autonomy from the Faeroese Situation since 1992,"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4 (Fall 1995), 第481-487页.

关系，也不同于国家和公民群体间的纵向关系。当中央政府授予某一特定地区以自治权时，中央政府实际上承认了它把一定比例的主权下放给该地区的代表们，中央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它对这块领土不再享有无限司法权——而无限司法权恰恰是自治权的本质。然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强调了自治区的从属地位，这使得自治区不可能因为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任何妥协。因此，国家和自治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对角线”，自治区就像是“国中之国”，即使没有任何政党正式承认它。

自治区是以典型国家形式为模式来建设的，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还拥有和国家象征符号比如旗帜和军装。实际上，自治区与国家共享一些特质，不过国家的首要特质——完全主权——则并没有被明确。自治区虽然常常宣称有拥有主权，但是这种主权实际上是片面的。当然，自治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本身不再拥有完全的主权，因为国家已经认可自治区与它自己分享了主权——虽然他们之间地位仍然有高下。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被定义为“俄罗斯联邦内部的主权国家”，此种定义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毫无疑问地它生动地表现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被用来探索关于主权问题的争端¹。

没有蓝图能够引导中央政府和自治区的关系，这个事实使得此种关系有助于充分发挥自治制度作为抑制或解决冲突的机制的作用，这个机制对特定少数民族的特殊怨恨来说，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享有国家独立主权的“社会”里，所有成员的关系都基于一些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例如国家之间相互平等、互不干涉以及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人权原则日益普及，民主政府日益壮大，但在国家-公民关系这一方面，民主方式并未被完全接受。中央政府和它的自治区之间的关系则兼具这两种关系的特点。

3. 自治权与分裂主义

那些有名无实的群体对外区隔、对内认同的意识的提升将会提高这个群体的凝聚力以及采取行动的意愿，同时建立政治制度更是会提高该群体的行动能力，因此进行自治区的制度建设将会对国家分裂主义产生促进作用²。自治影响了以下每一个领域：国界，族群认同感，国家制度，领导，大众传媒，以及外部支持。

4. 边界

构成完整自治区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是它们意识到并且明确划定了边界——以苏联为例，清晰边界在整个联邦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图上都能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桑蔡·威尼查库尔（Thongchai Winichakul）在他的新书《地图上的暹罗》（*Siam Mapped*）中都强调了边界的重要性。威尼查库尔认为东南亚就像是“一张预设好空间实体的地图，而不是相反。换言之，这张地图是为了它所象征的意义而设计出来的模型，而不是它本身固有的意义。它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它成为能够使地球表面的平面投影具体形式化的活脱脱的工具。现在对新政府来说，一张用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的地图是十分必要的……”³。安德森指出，“作为标志的地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张地图上标有的名称中的河流、山岳和周边地区都将消失，只有正在被谈论的领土边界才保留在地图上。地图是一种纯粹的标志，而不再是世界的指南针。”正如他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地图过去被用作“转化为海报、官方公章、信笺开头、杂志和教科书的封面，它们随处可见、并且时不时地被提起，因此

¹ Ildus G. Ilishev, “Russian Federalism: Political, Legal and Ethno lingual Aspects—A View from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26 (Fall 1998), 第724–759页. Reproduced as an appendix to the article is the Treaty on the Mutual Derogat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State Orga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State Organs of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in *Stanovlenie Dogovornykh Otnosheniy Respubliku Bashkortostan i Rossiyskoy Federatsii, 1990–1996 gg., Sbornik Dokumentov* (Ufa, 1997).

² 在相关文献中，群体凝聚力、行动意愿以及动员能力都被界定为引发种族政治冲突的主要类别。参见Gurr (fn. 2, 2000).

³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Si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这种标志地图深深地渗入了民众的想象当中，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化”¹。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身上。绘制了各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边界和形状的地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存在了，并且一直延续、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许多居民还清晰记得这一切。安德森认为，由于苏联内部边界几乎没有历史意义上的和实践意义上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地图和疆界是提前就对空间实体进行了划定。然而，对于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居民来说，共和国或者自治区的地形、地图或边界意义非凡。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象征意义变成了政治家手中的重要的整合策略工具。客观上看，划定一个想象出来的新国家的疆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成了非自治少数民族所不具备的一个优势。

5. 群体认同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自治实体在维持、促进以及提升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的重要性。例如，格尔指出“控制着自治政府的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集体行动的能力”²。提高族群认同的最首要的工具就是教育体系。正如在德米特里·戈伦伯格（Dmitry Gorenburg）所说的那样：

把一种强烈的族群意识植入个体需要这些个体在早期频繁地接触关于他们族群认同的信息。

在苏联的民族政策中，这种接触是依靠教育系统来实现的。通过为大多数拥有自己种族-领土行政单元的少数民族分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母语教学系统，苏联政府有效地使得学生们对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族群意识产生了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进一步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强化，而课堂正是学生们学习关于他们自己的祖先的历史文化的场所，他们的祖先被刻画为与这些学生们所属的现代族群有着基因上的直接联系。³

6. 国家制度

自治区拥有与国家相似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促成种族动员的关键因素。和那些非自治的少数群体不同，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拥有作为他们本族群选区和立法决策体系的政府和议会，而议会可以通过语言法令来拒绝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并颁布主权独立的宣言。因此，拥有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拥有了挑战国家一般统治或特殊政策的制度保障。相反地，一个缺少这种制度保障的少数群体将会发现他们要发起这种挑战会困难得多。在特定情境下，大众运动、请愿和游行示威或许会成为影响国家政策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自治结构已经存在，那么是组织此种活动甚至是激烈表现出大众不满的活动也将会容易得多。除了提高少数民族采取行动的法律意识，决策机构在任何试图将种族-政治诉求从一个隐性不满的层次提高到采取行动的层次也有关键的影响。正如迈耶所指出，自治“设置了一个统治分层，这种分层将管理者安置在等级明晰的制度中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地，自治“为科层制的角色运转设立了标准程序，并对角职责色的顺利执行或糟糕表现分别给予积极鼓励或消极制裁，然而这些都取决于自治结构中的领导层。”¹换句话说，自治机构中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领导的通常会驱使整个官僚系统都合理运转并且塑造出更加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形象。

7. 领导

¹ Anderson (fn. 2),第 175 页.

² Gurr (fn. 2, 2000).

³ Dmitry Gorenburg, “Nationalism for the Masses: Popular Support for Nationalism in Russia’s Ethnic Republics,” *Europe-Asia Studies* 53 (January 2001), 第74页.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治区拥有政府意味着他们也拥有自己的领导——这对于任何动员过程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自治区的领导具有相对较为强有力的基础，并拥有着常规普遍民族运动所不具备的一个优势，即前者领导层的职位能够得到制度化。迈耶认为，自治给予“一个族群政策执行和行政管理以合法性”，并“通过为不同的种族-政治动员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的制度来提高他们的凝聚力。”²制度化同时也使分裂主义成为一种规范，有助于保证“民族抗争”能够经受住领导权更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自治区，特别是在那些享有族群虚名的群体主导的地区，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群体也会提高政客们通过促进种族动员来扩张他们自己个人野心的可能性。由于自治制度是地方精英领导权的来源，因此对于领导人来说，提高自治区级别有着潜在利益，即精英权力与自治水平呈现正相关。在维系民众高度的民族主义敏感性、确保来自底层的压力能够支持或提高自治区级别这件事上，精英有自身的利益。

8. 大众媒体

自治区政府通常也控制着大众媒体——包括电视、广播站和报纸。因此，政府统治不仅仅通过教育系统来长期影响着民众的态度，而且也通常能够直接通过新闻报刊封面或者媒体中重大事件的描述——或平铺直叙，或大肆渲染——来直接影响民众，并且加速族群动员的进程。

9. 外部支持

自治的少数族群在国际政治（或者也是法律）上比那些非自治族群处于更高的地位，原因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自治的少数族群拥有机构制度并享有得到国家认可并下放的自治主权。由于自治区的制度能够保证资金和其他支持形式的渠道外部支持，因此对于自治的少数族群来说这更有可能是一个优势。

就像上面所列举的那样，自治对许多可能产生族际和平和谐的因素产生了阻碍作用。如果这个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自治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但这也未必意味着为了避免任何代价，自治是一个不可实行的制度。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必要对武装冲突尚未发生的和发生后的情况进行区分。首先，当武装冲突发生时，特别是在一个领土范围内，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发起冲突的人们进一步考虑是否要发表领土诉求；其次，对于那些在事实上控制着一定比例领土的少数族群来说，假设“它将会放弃他们在领土上的任何统治权”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区域自治并非完美、而且潜藏着危险性，但它可能是唯一灵活可行的折中方案；再次，虽然有些族群之间尚未发生武装冲突，但是避免通过自治制度将领土圈定在特定种族范围内也是十分必要而具有实践意义的。只要仍然存在着支持横向群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并削弱族群和领土的联系的地方，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而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种族联邦的方案。

10. “自治”以及不同解释

在转向关于区域发展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些批评所提出的潜在挑战——对于前苏联语境下的“自治”的分析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前苏联真正的自治区是不存在的。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断被炮制出来以显示苏联是自治联邦，但实际上苏联几乎就是一个单一政体的统一集权国家。然而，这样下结论会忽视一个关键——自治区处理自身与冲突的关系的机制之一正是处在制度结构和象征符号领域里的。进一步而言，这样的特定领域，例如教育领域，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民族精英骨干的培养等领域中，即使真实的政治自治缺失了，联邦结构在整个苏联时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正如卡罗尔·斯卡尔尼克·利夫（Carol Skalnik Lef）根据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作出的论断那样，过渡期的种族联邦制度形式更早地根据一纸公文进行角色实践：“在可商榷的情境下，民族主义是扩散的这一点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同，如果政治公开化，联邦结构为加盟共和国提供基础用以挑战现存的政治秩序，同时也为过渡期的核心行动

¹ Meyer (fn. 10), 第 2 页.

² 同上

者提供特有的机遇。”¹这一论述，虽然成文于非领土联邦中央下的联合共和国的情况下，但它与自治区一样令人信服。

另一个先入为主的反对意见宣称，最初获得自治权的少数民族首先有更大的怨恨、并且与他们的中央政府有过更激烈的冲突。毕竟一般而言，自治权是作为对种族需求的回应而被授予的。与那些先前并未提出此种诉求的少数民族相比，这更像是实践复兴的分裂主义。然而，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建立的超过30个的自治区并不是对某些种族诉求的回应。苏联特殊的国家结构建立在种族联邦主义之上，而少数民族在地图上被标注出来、被评头论足、并且根据最高决者（即尊贵的斯大林）他自己的一时兴起而被安排在特定的地位。我们终究无法得知，为什么一些特定的少数群体获得自治权，而其他某些群体并没有享有自治权，但是相对肯定的是，这个决定的讨论几乎与少数民族真正的要求几乎毫无关联。

在苏联的末期，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3个南高加索共和国内部拥有9个聚居的少数民族²。在这9个少数民族中的4个享有自治地位，即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自治地区的南奥塞梯人，以及在苏维埃政府机构中拥有更高自决权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阿布哈兹人和阿扎尔人。非自治的少数民族是亚美尼亚的阿泽里人、格鲁吉亚的阿泽里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阿塞拜疆的列兹金人和塔雷什人³。在苏联末期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以及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独立转型期，爆发了三次族群暴力冲突，它们全都是发生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少数民族之间。这个结果，乍一看似乎是与直觉不相符的，因为在一个既存在着自治的也存在着非自治的群体的地区内，逻辑假设本应如此：并非那些享受着自治地位的群体、而是地区内没有获得自治权的群体将会有更多的不满，于是他们将更有可能对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而非自治少数民族将会倾向于要求获得与自治族群相似的地位，因此自治的少数民族群对自己当前的地位可能会更为满意。然而，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在南高加索冲突模式并不遵从这样的逻辑。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开始，在5个非自治少数民族中并没有产生基础广泛、组织良好或令人信服的分裂运动萌生，但相反，所有4个自治少数民族都表现出了高度分离倾向，并且除了阿扎尔自治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都以武装冲突结束。这种在自治与冲突之间明显一致性的是虚假相关、还是象征性的因果联系？关于种族冲突根源的研究指出，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冲突是否发生做出解释。为了证明自治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将“自治”与其他因素分离开来——这些因素范围极广，从文化差异性导致的歧视、地形地貌、经济条件一直到外部因素等等都囊括在内。

在大量的解释因素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南高加索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即促成了自治孤立，而这正是冲突的一个根源。首先，高加索共和国在苏联的成员身份使得它在享有政治自由的同时也几乎相同程度地受到政治歧视。在独立共和国里的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与此相似的人口差异。尽管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或者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宣称，他们比其他族群遭受到了更多的不公正待遇，但他们的这一申诉及其政治表达必须在适当的角度被加以考察。苏联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对公民人权和政治权利几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于是很难界定特殊群体或所有国民是否成为国家滥权的靶子。谁应该因为不公正待遇而受到指责呢——是共和国还是苏联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大多数的决定是在莫斯科制定的，那么事实上谴责各个加盟共和国政府有点不合逻辑，而关键就变成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歧视的存在。虽然已经有一些例外，但是相对于大多数著名的二战期间在种族灭绝政策下“受到镇压的人民”被驱逐出境的案例而言，今天

¹ Leff (fn. 12), 第 210 页.

² 这里的少数民族被定义为：在一个在一定领土管辖权下、带有明确称谓的居民群体。因此，在南高加索，由于纳希切万 (Nakhjivan) 自治共和国的人口过去是并且现在依然是阿塞拜疆人 (阿塞拜疆人占了93%)，并且在阿塞拜疆管辖权之下，因此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被排除在此研究范围之外。

³ 对高加索地区冲突的翔实分析可以参见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Richmond, UK: Curzon Press, 2001).

在南高加索地区，已经没有人会被驱逐¹。对不公正待遇的意识可能被自治区的政治精英们所利用，但在非自治少数民族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精英。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本研究中的所有少数民族都定居在他们各自共和国的一个广阔地区内，与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有种族-语言相关的人群相毗邻。所有的少数民族在面积上都差不多，而且与他们所在的完整国家的总人口相比，它们族群人口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进一步而言，在给定的南高加索地区相对小的地理范围内，共产主义转型期苏联军事力量同样渗透进了三个共和国内部，对所有少数民族来说在武器的获得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实际上，由于整个地区都处于武装当中，在本研究中把这个参数看作另一个因素。因此，高加索局势的特殊性允许我们在研究中研究排除那些在所有案例都起着相同作用的因素。

援引文献中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我们发现促成种族政治冲突的原因具有高度相似性，有许多自治之外的因素也能够对结果的差异性做出解释。有一些因素是与本研究相关的，它们包括：少数民族与全体国民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程度；国家民族观念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公民意识还是作为种族意识（相对而言，后者不利于适应融合）；过去冲突的紧张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夸大其实的神话；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形，即崎岖不平的土地，特别是山脉²；少数民族是否在其所定居的地区占据人口上的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是否在周边国家拥有同族的亲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否具有经济自给的能力；少数民族民众中是否存在激进的领导人；最后，这个少数民族是否拥有外部支持。这些因素与“自治”是相互作用的，实际上，鉴于先前提到的原因，自治提高了对过去冲突以及激进领导加以神话化的可能性。对上述列举的因素加以程式化，这个程式与种族动员程度、少数民族挑战中央政府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程度具有正相关³。

通过对自治区与冲突的关系以及自治区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比较，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自治区角色的大概印象。虽然在本研究中，这些案例和独立变量的数值预先排除了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但是通过对包括自治在内的不同因素并研究在特定案例中是否会引发冲突进行比较，我们获得了一种对相关原因的解释力进行测量的方式。用统计学术语来说，这种技术费雪精确概率检测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Test 有关，是用于分析小样本不连续数据的。首先，我们对每个案例中武装冲突发生与否进行“是”或“否”的直接赋值（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发生了武装冲突，而其余的6个则并未发生冲突）。其次，通过同样的方法，对每个案例中的每个可能的原因进行“是”或“否”赋值。然后，每一个因素的解释力由这个因素与实际情况（即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而言，冲突是不是发生了）是否一致来决定。在一个理想的共变案例中，所有关于“没有冲突”的地区在与之相关的因素上应该会有一个“否”的分值，而那些“有冲突”的案例则相反，被标为“是”。

表1总结了这些原因的总体发现。我们认为，这样的案例可以作为支持这个分析方式：一个标有“否”的因素与发生冲突的实际是否相一致，或者一个标有“是”的因素是否与冲突发生相一致⁴。

表1表明，9个案例中的自治及其竞争性解释在这10个可能的原因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表现出完全相关。有3个因素的解释力得到了7个案例的支持，但是只有一个指标（自治）同时在8

¹ 南格鲁吉亚的麦斯赫土耳其人于1943年被驱逐，至今仍未允许他们返回世居地。

² 费伦和莱廷发现，“由于苏联的解体，山地族群与国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增加了6倍”。此外，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崎岖复杂的地形也被用来解释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是如何能够“与国家进行重大的游击斗争”参见 Fearon and Laitin (fn. 5), 第18-20页。

³ 族群动员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冲突只会发生在中央政府决定以武力回应少数民族所发起的挑战的时候。当然，如果政府完全听任处于相关省份自行其事的话，分裂可以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不过，和平分裂的案例如凤毛麟角。另一个选择是与少数民族的精英合作，或是通过在中央政府中的整合，或是仅仅通过贿赂。但归根结底，中央政府以武力应对少数民族在领土问题上的挑战是一个基本立场，而不是破例。

⁴ The full suppor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coding of factors and cases relevant to this study, including tables for each factor, is available at <http://www.cornellcaspiian.com/autonomy.html>.

个案例中得到支持，只有格鲁吉亚的阿扎尔不支持“自治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这一观点，它代表了未与中央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自治区的案例。这个发现并不会削弱本研究的观点，正如先前所提及的那样，自治既不是冲突发生的非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俄罗斯联邦有超过12个自治共和国，单只有车臣这一个共和国自80年代末期的政治自由化运动以来与俄罗斯发生了武装冲突。

表1

因素	支持该因素解释力的案例数量
自治	8
外部支持	7
历史冲突	7
经济维持能力	7
地形地貌	6
激进的领导	6
族群/公民的国家观	6
文化差异	5
同族亲戚	4
人口学优势	3

这一简单的研究加强了上述理论观点的基础，因为相对于在研究中所提到的其他因素而言，自治更能解释高加索种族冲突发生的原因。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自治是种族冲突的终极原因。也许不够充分的样本数量使其不能够得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满意结果，相关也可能是虚假的；而且，这个研究并没有增加我们对使得自治成为冲突原因这个实践意义上的机制的认识，同时本研究也没有解释在何种情况下、与何种其他因素相互相关，自治会成为种族政治冲突的一个促进因素。因此，对可获得的经验资料做进一步地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 自治实践：1987-2000 年格鲁吉亚的冲突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因此对这三个国家进行粗略调查所得到的9个案例之间存在着可比性的不足。一般的政府政策在中央一级就产生混乱，并且与任何单个国家的外交关系都可能影响到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格鲁吉亚展现了所有研究中所发现的差异，因此尽管对这9个案例的详细研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聚焦格鲁吉亚还是既适宜又有益的。格鲁吉亚仍然包含着五个聚居的少数民族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阿扎尔人、南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拥有自治区，而亚美尼亚人和阿泽里斯人从未有过自治权。接下来的分析将包含1987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第一起从苏联分裂的运动）至2000年之间的事件。在这期间，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发生了武装冲突，阿扎尔保持了高度自治，但有时会卷入与格鲁吉亚政府间高政治级别的非武装的政治冲突。扎瓦赫季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有时会表达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任何成熟的族群动员。最后，这一时期阿泽里斯少数民族几乎是完全的沉默。

格鲁吉亚最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发生在阿布哈兹，尽管阿布哈兹族的人口在所有格鲁吉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少于2%，而且他们在自己的自治区中也只占17%，分离主义领导人却成功地获得了整个地区的控制权。在程度较低的南奥塞梯自治区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该地区奥塞梯人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但也只有67,000人；然而分离主义领导人依然成功地控制了一半的地区。这种情况是如何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尤其是在格鲁吉亚政府坚决反对和强力打击分离主义分子的形势下？

相反，尽管十年来政治观察家一直警告涉及扎瓦赫季亚美尼亚人的武装冲突，但客观而言这类冲突并没有发生，虽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实际上，在没有冲突发生的这六个案例中，扎瓦赫季的分数显示出最高的冲突倾向（扎瓦赫季有 7 个指示因素，相比之下阿扎尔是 5 个，其他三个案例是 4 个，阿塞拜疆的塔里什案例是 3 个）。扎瓦赫季的得分有异于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的原因只在于它缺乏自治权。为什么一个可靠而强大的分离运动没有如指示表明的在扎瓦赫季发生呢？

最终，阿扎尔成为代表南高加索地区没有参与和中央政府之间暴力冲突的自治区的唯一案例。尽管几乎没有其他的指示指向阿扎尔发生冲突的高危性，但阿扎尔曾经历了很多在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导致冲突的情形。那么阿扎尔是如何避免武装冲突的呢？

下文将更深入地探讨这四个案例（连同阿塞拜疆）的细节。

1. 阿布哈兹 (Abkhazia)：不可能的意外

阿布哈兹的冲突并非偶然。¹ 1989 年，阿布哈兹族的人口是 50 万，只占人口的 17%，而格鲁吉亚人占了 45%，亚美尼亚人占了 14%，俄罗斯人占了 12%。1978 年和 1988 年曾出现过不同族群之间的短暂矛盾，但是仍然保持着克制状态。然而 1989 年 6 月，首都苏呼米的族群冲突造成了 12 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²。尽管存在着这些冲突，在政治家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统治的 1990-1992 年间，阿布哈兹相对平静。但是格鲁吉亚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奥赛梯人、亚美尼亚人、阿扎尔人和阿泽里斯人，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正是在 1992 年初加姆萨胡尔季阿下台之后，第比利斯和苏呼米之间的冲突开始加剧。

1990 年 12 月，历史学家弗拉季斯拉夫·阿尔金巴 (Vladislav Ardzinba) 当选为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一项提供 65 个议会席位的新选举法被采纳。其中 28 个席位保留给阿布哈兹人，26 个给格鲁吉亚人，剩下的席位分给了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和希腊人。至此，尽管阿布哈兹人的数量只占总人口的 17%，却控制了 43% 的议会席位。1991 年秋，处于动荡中的第比利斯依据这些规定选举了的一届议会，并且最终推翻了加姆萨胡尔季阿政权。但这届议会很快分裂为两个派系：一个是由阿布哈兹领导的、主要由非格鲁吉亚议员组成的派，另一个是格鲁吉亚派。两个派系的主要争端在于选举法含糊地规定了重要事项需求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阿布哈兹领导派反对这一点，但是格鲁吉亚派将这项措施视为自身地位的保证。

在议会选举之前，一项由莫斯科发起的关于重建苏联的新协议的公民投票引发了紧张局势。格鲁吉亚政府希望退出苏联，因此拒绝开展公民投票；但与此同时公民投票在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举行，那里忠于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人抵制投票。11 月，苏呼米召开了“高加索地区山地族群代表大会”（奥赛梯人、北高加索族群包括车臣人都出席了），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关于建立“高加索地区三地族群联盟”的文件，地区性扩展在阿布哈兹发展起来。1991 年间，阿布哈兹通过建立政治机构来保护阿布哈兹派的统治地位，并在阿布哈兹（与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地区（与北高加索族群）打造种族联盟，继续将自己从格鲁吉亚中分离出来。这些离心趋势在第比利斯引起了注意。1992 年夏初，一个格鲁吉亚高级代表团行至苏呼米，讨论第比利斯和苏呼米之间的分裂力量，但谈话没有结果³。随着双方关系愈发，不久阿布哈兹的领导弗拉季斯拉夫·阿尔金巴就声称阿布哈兹已经“强大得足以对抗格鲁吉亚”。考虑到阿布哈兹人口数量和军事装备或训练的不足，这份声明多少是令人惊讶的⁴。尽管如此，在同一年夏天，阿布哈兹还是恢复了 1925 年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⁵。

如果没有阿布哈兹在自治共和国政治中的支配地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下

¹ 关于冲突的详细分析参见 Cornell (fn. 34), 第 142–196 页。

² 参见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1, no. 29 (1989), 第 14–16 页。

³ *BBC Monitoring Service*, June 18, 1992, quoting Russian television “Rossiya,” June 16, 1992.

⁴ “Georgia: Abkhazia ‘Strong Enough to Fight Georgia,’” *BBC Monitoring Service*, July 30, 1992.

⁵ *BBC Monitoring Service*, July 25, 1992. 1925 年宪法确实规定阿布哈兹通过一个特别盟约与格鲁吉亚相联系，但事实上，阿布哈兹等于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第比利斯也这么认为。

的这项族群政治运动将不会成功。作为有名无实的国家，阿布哈兹从确保对共和国机构完全统治的积极行动政策中获益，尽管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此外，除了共和国议会席位中保留给阿布哈兹人的定额之外，实际上超过三分之二的政府官员由阿布哈兹担任，并且地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阿布哈兹人¹。因此，通过形成包括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联盟，阿布哈兹人确保了他们对议会的控制，并且得以主导共和国政治的发展、操纵在第比利斯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以便阻止格鲁吉亚人获得多数票。自治组织的存在对于阿布哈兹在控制政治机构和领土以及补偿他们人数劣势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除了控制这些共和国组织，他们在建立独立的阿布哈兹国家时所面临的挑战还是使人沮丧的。实现和平分裂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考虑到格鲁吉亚对于奥赛梯的分离主义采用暴力给予回击。此外，阿布哈兹不仅要应对由整个格鲁吉亚动员起来的力量，还要处理阿布哈兹地区内部忠于第比利斯的为数众多的格鲁吉亚人。考虑到以武装获得独立的前景似乎难以实现，1992年夏阿布哈兹领导人所展示的自信就显得令人费解了。

然而随后的事件带来了希望，支撑起他们的信心。控制力和约束力不足的格鲁吉亚准军事力量在八月中旬袭击了阿布哈兹，占领了苏呼米并把阿布哈兹军队击退到俄罗斯边界。但阿布哈兹于10月初进行了反击，他们出乎意料得到重军备武装，并获得了北高加索志愿者的帮助和俄罗斯的空中支援。1993年9月，苏呼米最终被阿布哈兹夺回，生活在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几乎全部被驱逐。自1993年末，双方之间维持着不稳定的停火状态，然而这种状态于1994年初和1998年5月其间被打破²。1992年，阿布哈兹族群政治自信的激增，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对由现实情况的认识，即冲突事件一旦发生，外部支持就必然会卷入。阿布哈兹领导人和俄罗斯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北高加索地区几乎是人尽皆知³，因此阿布哈兹所获得的重军事装备很有可能是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

阿布哈兹地区的族群动员和冲突可以清晰地归因于许多因素。对格鲁吉亚的不满，尤其是1990-1992年间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制造紧张局势中所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在全国促成了所有少数民族的动员。此外，分离主义者能够获得外来支持这一点在影响阿布哈兹走向对抗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但关键因素是，自治组织的存在使得阿布哈兹人能够形成领土管辖和行政管理的政治精英。如果没有自治，阿布哈兹精英就无法掌控必要的机构，例如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政权，从而得以正当地做出从格鲁吉亚脱离的决定。这些机构也加强了阿布哈兹精英们赢得外部支援的能力。通过这些从苏联共产党组织处继承而来的联系和渠道，阿布哈兹精英得同前苏联军事力量建立了联系，这成为支持斗争的重要保证。毋庸置疑，自治的存在是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脱离出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2. 南奥赛梯(South Ossetia): 议会权力

最初，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的可能性并没有阿布哈兹大。和阿布哈兹人不同，尽管奥赛梯人于1989年在他们的自治地区的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正好超过三分之二），他们的数量也是极少的，大约是67000，而总人口也只有98000。但是，有几乎100,000奥赛梯人分散在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和阿布哈兹一样，奥赛梯人相对于格鲁吉亚人而言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体，但他们在北高加索地区（即俄罗斯的北奥赛梯自治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1988年11月的一项法令强化了格鲁吉亚语言在南奥塞梯的地位，这导致次年的骚乱⁴。1989年秋正式爆发被定义

¹ 参见 Darrell Slider, "Democratization in Georgia,"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170页。

² 参见 Cornell (fn. 34), 第4章。

³ 同上, 第142-196页

⁴ 参见 Elizabeth Fuller, "Draft 'State Program' on Georgian Language Published," *Radio Liberty Research Report* no. 559/88, December 12, 1988.

为“法令之战”的冲突，这是“法令之战”的第一步¹。伴随着改革的进展，一个叫做“埃德蒙·尼克哈斯”（Ademon Nykhas）的奥赛梯人民阵线出现了，它在1989年春天寄了一封公开信给阿布哈兹人，支持他们的分离声明。暴力分离的事件开始在南奥塞梯出现，关于奥赛梯和格鲁吉亚的武装团伙的游击战的报道贯穿了整个夏天。8月，第比利斯采取措施规定格鲁吉亚语是公众生活中唯一的官方语言²。这样的条款将会影响南奥塞梯，因为只有14%的南奥塞梯人懂得格鲁吉亚语（当然这个数字略高于阿扎尔和阿布哈兹），因此南奥塞梯的自治政权的级别较低。这推动了南奥塞梯与北奥赛梯联合运动的形成，并且相应地，“埃德蒙·尼克哈斯”向莫斯科发送了行动支援的请求。

到了9月底，局势紧张发展到了极点，负责国内安全的内务部军队不得不开赴边疆地区。尽管一直在尝试稳定局势，但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是开始爆发了。11月初，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要求将南奥塞梯提升到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而在一周之内，格鲁吉亚共和国确认了它有权从苏联脱离，这加剧了南奥赛梯的紧张局势，导致整个秋天充斥着族群冲突，并造成多人死亡³。在南奥塞梯，精英们开始重新装备上阵，推动最高苏维埃更接近“埃德蒙·尼克哈斯”阵线的立场。对此，11月末加姆萨胡尔季阿政府组织了超过10000人参加的“向茨欣瓦利进军”⁴的游行示威活动作为回应。此次游行被宣传为“调解的和平游行”，但是奥赛梯人把它理解为炫耀军力，于是他们阻碍游行，引发一场只有苏维埃内务部装甲部队参与才能解决的武装冲突（无论如何，冲突还是持续到了1990年1月）。1990年8月，格鲁吉亚立法禁止地方性政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立即给予反击，单方面地将自己的地位提升为“独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1990年12月初“新”南奥赛梯的最高苏维埃大选召开后，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废除了南奥塞梯自治州。至此，只有苏联军队能制止武装冲突⁵。

在罢免加姆萨胡尔季阿和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就职之后，第比利斯政府的变动暂时缓和了局势，但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导致得苏军维和部队的撤离，终于引发1992年4月的冲突。无论是炮战的激烈程度还是在北奥赛梯的聚集，这次北高加索志愿者们支持比后来他们给予阿布哈兹人的支持更加强有力。俄罗斯政府也公开站在奥赛梯人一边，到了1992年春天，持续的冲突风险转变成格鲁吉亚-俄罗斯战争危机⁶。但是，这一威胁迫使格鲁吉亚新政府在1992年6月底屈服于俄罗斯主导的维和力量，该力量有效地使格鲁吉亚撤出南奥塞梯几乎一半的疆域。

最初卷入格鲁吉亚-奥赛梯冲突的只有南奥塞梯自治区边界的65000名奥赛梯人。“法令之战”的结果是冲突升级，在“法令之战”中原先照本宣科的南奥塞梯苏维埃议会转变成了实现奥赛梯政治抱负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在一个月内使奥塞梯语成为南奥塞梯的官方语言并随之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见，自治机构在冲突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关键。1989年9月，随着格鲁吉亚语言法令的宣布，南奥赛梯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在加姆萨胡尔季阿“向茨欣瓦利进军”之前，德蒙·尼克哈斯阵线已经请求在俄罗斯联盟中实现南北奥赛梯统一。相反地，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却满足

¹ 参见 Catherine Dale,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Dynamics of the Conflicts,” in Pavel Baev and Ole Berthelsen, eds., *Conflicts in the Caucasus*, Report no. 3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第13–26页。

² 参见 Elizabeth Fuller, “South Ossetia: Analysis of a Permanent Crisis,” *Report on the USSR*, February 15, 1991, 第21页。

³ 同上

⁴ 参见 Julian Birch, “The Georgian/South Ossetian Territorial and Boundary Dispute,” in J. Wright et al., eds., *Transcaucasian Boundaries* (London: SOAS, 1995), 182. 茨欣瓦利是南奥塞梯自治州的首府。

⁵ 参见 Elizabeth Fuller, “Georgian Parliament Votes to Abolish Ossetian Autonomy,” *Report on the USSR*, December 21, 1990, 8; Rachel Denber, *Bloodshed in the Caucasus: Violations of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Georgia-South Ossetia Conflict* (New York: Helsinki Watch, 1992), 第8页。

⁶ 参见 Alexei Zverev,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Caucasus, 1988–94,” in Bruno Coppetiers, ed., *Contested Borders in the Caucasus* (Brussels: VUB Press, 1996), 第46页。

于宣布奥塞梯语是地区官方语言，并且请求莫斯科提高它的地位成为同阿布哈兹一样的自治共和国。随着冬天形势的恶化，来自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的决策进展迟缓。在这几个月中德蒙·尼克哈斯阵线显然控制了公共机构，到了9月份，它放弃了和解妥协，并声明要从格鲁吉亚完全独立。很显然，在冲突升级中，南奥塞梯领导层所使用的预先存在的立法机关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正如即将被讨论的，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并没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他们的民族组织无法承担起动员的作用。在南奥塞梯，自治权为奥塞梯领导层提供了应对第比利斯的决策机制，从而加剧了紧张程度。与阿布哈兹相似，外部支持在冲突发展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到1991年末外来行动者深度卷入冲突的时候，冲突就已经升级并脱离了控制。尽管北奥塞梯的存在确实激励着南奥塞梯人采取行动，单是正是自治权提供了南奥塞梯冲突发展的可能条件。而除了缺乏自治权和缺少冲突，扎瓦赫季与奥塞梯的案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以作为该论据的进一步说明。

3. 扎瓦赫季(Janakheti): 逃离战争?

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主要集中在靠近亚美尼亚自治共和国边境的萨姆茨赫-扎瓦赫季州，大多数人居住在阿哈尔卡拉基和尼诺茨明达地区¹的亚美尼亚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群体，他们大约是150,000人。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了与南奥塞梯人和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亚美尼亚人的相似之处。1918至1920年间，随着亚美尼亚少数民族在的亚美尼亚边界附近聚居，扎瓦赫季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都成为短暂存在的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之间争夺的重点²。事实上，尽管那一时期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战争显然更为严峻，但战争还是在扎瓦赫季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两个地区都打响了。这些亚美尼亚人和它们的所属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由于亚美尼亚人有强大的族群认同感，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家的亚美尼亚人都感觉到他们被排除在这大部分公民对两个国家民族构想的理解之外。与格鲁吉亚的阿扎尔人和阿塞拜疆的列兹根人不同，亚美尼亚人并不被视为是国家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这两个群体都居住在山地——扎瓦赫季的首府阿哈尔齐赫的海拔大约3600英尺。当然，差异也是存在的。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是非常显著；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是信仰基督教的群体（尽管他们的宗教仪式不同），但是阿泽里斯人是穆斯林徒。几乎可以断言，虽然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历史关系有时会被描绘为消沉猜疑，但是除了1918-1919年的短暂战争以外，很少有公开冲突。相反地，亚美尼亚人普遍地把阿泽里斯人与土耳其人等同³，并视其为造成种族灭绝的凶手。1905-1906年和1918-1920年期间，亚美尼亚人和阿泽里斯人爆发了战争。由于流传至今的历史积怨和神话化，亚美尼亚-阿泽里斯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人的更为复杂。

扎瓦赫季是阿哈尔齐赫的中心地区，也是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士兵、命令军官以及三分之一的军官都是由当地的亚美尼亚人担任的。这表明，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享有外国资助者的支持，而且能够获得充分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实际上，自格鲁吉亚独立以来，扎瓦赫季已成为令政府倍感棘手的问题。然而亚美尼亚的经营者在与格鲁吉亚政府的关系中依然处于弱势，很大程度上也无法将他们的声音传达到第比利斯或是迫使对方做出任何重要让步。除了这些挫折之外，他们也没能成功动员起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¹ 若要对此问题有整体把握，参见 Voitsekh Guretski, "The Question of Javakheti," *Caucasian Regional Studies* 3, no. 1 (1998) (poli.vub.ac.be/publi/crs/eng/0301-05.htm, accessed October 2001); Ugur Akinci, "Javakhetia: The Bottle-Neck of the Baku-Ceyhan Pipeline," *Silk Road: A Journal of West Asian Studies* 1 (December 1997); Igor Rotar, "Tbilisi Has Only Partial Control over Georgia's Armenian Regions," *Jamestown Prism* 4 (May 15, 1998); Levon Sevunts, "Squeeze Play in the Caucasus: Russia Could Tighten Its Grip as Georgia, Armenia Break Out of Bear Hug," *The Gazette (Montreal)*, November 29, 1999.

² 参见 Firuz Kazemzadeh, *The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917-1921* (Oxford: George Ronald, 1951).

³ 阿塞拜疆是土耳其人的一支，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十分相近。不过，他们历史上长期与土耳其政治区域相分离，而且更接近伊朗。

和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南奥塞梯相似，1989-1991年加姆萨胡尔季阿在格鲁吉亚领导的民族运动使扎瓦赫季亚美尼亚人幡然醒悟；而在“埃德蒙·尼克哈斯”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叫做“扎瓦赫克”的政治行政机构，它为创建与格鲁吉亚的其他自治区级别相同的亚美尼亚自治区而战。在加姆萨胡尔季阿统治期间，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面对的最紧急的争端和南奥塞梯的亚美尼亚人所面对的情况类似，那就是语言争端，它排在了议程首位。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一般说本民族的母语和俄语（俄语是苏联时期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但是很少有人说格鲁吉亚语，所以1998年的强化格鲁吉亚语地位的法令被视为是对少数民族的威胁。与此同时，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口在缺乏政治和领土自治的情况下，却在事实上已经享有了文化自治。这一地区大部分的学校是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因此这阶段格鲁吉亚的立法也同样地影响了亚美尼亚人。“扎瓦赫克”没能得到民众持久而有效的支持，并且始终受到内部阻碍，因此在组织中缺乏清晰的管理。有时它的立场是矛盾的：组织的某些声明看起来似乎有意和第比利斯和解，然而其他关于亚美尼亚自决的要求却十分强烈而激进。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集中中央政府对官员的任免，加姆萨胡尔季阿政权即是因此上台的。通过大规模游行示威，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完全阻止了三次不同的格鲁吉亚族的特派高级行政长官就职¹。为了解决合法统治权的缺失的问题，一个由选举产生的24位阿哈尔齐赫地区的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务会的建立了。换句话说，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在建立自治机构方面单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些机构最初致力于自治运动或是分离主义运动，而他们在谢瓦尔德纳泽升任格鲁吉亚首脑之前基本上就自我分解了，这使得它们的普遍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总的来说，亚美尼亚自治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能力为他们的斗争创建合法机构，先前也没有存在可以为他们所用的公共机构。1995年，格鲁吉亚当权者成功地将扎瓦赫季与它的西部马斯克希特那里的居民大部分为格鲁吉亚人）合并，创造了新州萨姆茨赫-扎瓦赫季。“扎瓦赫克”将这一次迁移解释成在南格鲁吉亚行政单元中人为地削弱亚美尼亚人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地位的尝试。尽管迁移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反，但它确实增加了亚美尼亚人对第比利斯的怨恨和怀疑。

扎瓦赫季缺乏冲突这个事实必须与那里缺少强大合法的民族独立主义领导力量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特别是与南奥塞梯相比，后者有着类似的冲突可能。最初“埃德蒙·尼克哈斯”并不具备比“扎瓦赫克”更高的普遍合法性，二者后来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就在于，南奥塞梯所享有的自治权有利于团结和加强围绕着地区行政机构的民族独立主义/分离主义运动。在扎瓦赫季，“扎瓦赫克”运动需要在内部逐步奠定自己的地位，包括创建临时性的行政组织；而在南奥塞梯，这类机构早已存在，并且建立了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被广泛接受的决策过程。民族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不仅仅由他们的品质和成就所决定，也取决于他们已拥有的职位级别。此外，当格鲁吉亚议会提出不利的法案时，扎瓦赫季亚美尼亚人除了请愿或民众游行示威以外，很少对此进行其他方式的抗议作为回应。与之相反，南奥塞梯人拥有一个立法实体即自治州的最高苏维埃，它为他们反对格鲁吉亚人活动的斗争提供了制度渠道。同样地，“扎瓦赫克”的内部争议导致了行动无力，更别提加强这种行动，这反映出缺乏清晰的决策等级制度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正如南奥塞梯案例所证明的，自治组织拥有这样一条需求链，它有助于决策过程并促进决议执行水平的提高。

其他因素在扎瓦赫季相对和平的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格鲁吉亚政府已经被另外两个分离运动击败，因此它变得小心谨慎以防激怒扎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其次，亚美尼亚政府关注自身与格鲁吉亚关系的重要性，一直慎重防止地区潜在问题的发生，并多次介入其中阻止“扎瓦赫克”针对自治或分离开展公投。亚美尼亚政府平息事态的做法也使得俄罗斯军事基地提供的外部支持也有所缓和。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仍需指出的是缺乏自治是扎瓦赫季的民族动员不足和缺乏武装冲突的重要原因。

¹ Guretski (fn. 54).

4. 阿泽里斯 (Azeris): 沉默的群众

阿泽里斯人主要集中在格鲁吉亚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他们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更不用说什么动乱或分离运动了，这些情况在格鲁吉亚的阿泽里斯是人尽皆知的。然而，阿泽里斯人却使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恐惧，因为格鲁吉亚的阿泽里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生育率迅速增长。1989年，一些格鲁吉亚非正式团体强迫博尔尼西地区的数百个阿泽里斯家庭并入阿塞拜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是1990年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阿泽里斯人之间的情报失误，在此事件中有一个谣言说阿泽里斯人将要正式脱离格鲁吉亚加入阿塞拜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群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就聚集起来并向阿泽里斯地区进发。在与阿塞拜疆人民阵线进行了协调并使其确定不再进行分裂活动后，格鲁吉亚当局有效控制了局面、防止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在后独立时期，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之间密切的、逐步改善的关系确保了这一地区的稳定性¹。阿泽里斯人居住的相对分散在格鲁吉亚的南部和东南部，他们在马纽里、博尔尼西和德马尼西地区占到了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其余人口由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组成。格鲁吉亚没有明确划定阿泽里斯地区边界，而且阿泽里斯人缺乏自治也使得他们很难强调那块地区是属于“他们的”。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消除了对格鲁吉亚境内的阿泽里斯民族独立主义者的实际上的外部支持；也没能形成一个民族主义领导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格鲁吉亚境内的阿泽里斯人主要居住在乡村地区，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他们与格鲁吉亚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相当疏远。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说格鲁吉亚语，从数字上看，获得较高水平教育的比例很低，而且格鲁吉亚政府也很少致力于他们的一体化。尽管存在着关于他们的怨恨和疏离感的报道，但是这种怨恨和疏离感并没有获得有效的表达渠道。与自治区不同，阿泽里斯的国家领导力量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因为民族政治活动处在一个较低水平，而且阿塞拜疆政府的有效作用，以及缺乏自治权，这使得阿泽里斯成为格鲁吉亚动荡的后改革历史时期里最平静的地区之一。

5. 阿扎尔(Ajaria): 地方分权主义的强化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阿扎尔是南高加索自治区中惟一个没有卷入与其中央政府的武装冲突的案例²。很少有迹象表明阿扎尔和格鲁吉亚之间民族冲突存在高风险，因此这并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阿扎尔人在实际上也是格鲁吉亚族的一支。和大多数人相比，他们与格鲁吉亚人的区别主要由于他们的穆斯林宗教信仰。阿扎尔居民的大多数吸收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1878年灭亡的土耳其帝国统治的数个世纪中），同时又保留了许多和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的相似的文化特性。也许这会造成为一个疑问：将他们分类为一个少数民族是否恰当？基督教确实构成了格鲁吉亚人身份的重要部分，但经过70年的苏维埃无神论思想教育之后，阿扎尔人的伊斯兰教对于这一地区居民的控制力已经相对较弱。因此阿扎尔人在主流定义中依然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族，也就是说格鲁吉亚没有其他少数民族。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阿扎尔一直被当地怀有强烈政治野心的统治者所控制。阿斯兰·阿巴希泽 (Aslan Abashidze) 来自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当地贵族家庭，他于1991年就任阿扎尔领导者，并自那以后强加给阿扎尔日益独裁的统治。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战争以及格鲁吉亚北内部争斗期间，阿巴希泽通过保持中立巧妙地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权。此外，通过发展与土耳其商业贸易联系以及使用黑海沿岸的巴统港口资产，他成功将阿扎尔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从另一方面来看，格鲁吉亚政府期望它所管辖的各个州没有更多的麻烦，因此在大部分事务上都让阿扎尔自行处理。尽管阿巴希泽认同谢瓦尔德纳泽为争取格鲁吉亚总统职位所作出的承诺，但随后第比利斯企图在格鲁吉亚权力机构内控制阿扎尔，这导致了巴统和第比利斯之间关系

¹ 作者在第比利斯和马纽里的访谈，1998。

² 参见 Judith Hin, "Ajaria.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Favorable Economic Location, and Minor Ethnic Tensions: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Potentate in Keeping Violent Conflict at B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2000). 此篇论文基于布朗大学研究项目的未刊稿

的恶化。举例来说，阿扎尔拒绝根据国家标准来调整自己的法律。尽管阿扎尔人的案例清晰的展现了地方主义的要素，但这并不具有明显的种族色彩。确实，尽管阿巴希泽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基于阿扎尔，但他一件将自己认定为格鲁吉亚国家层次上的政治家，并且在实际上对谢瓦尔德纳泽和他的格鲁吉亚市民联盟党形成了最强有力的挑战。查尔斯·H·费尔班克（Charles H. Fairbanks）很好地总结了阿扎尔的形势：

当地的领导者阿斯兰·阿巴希泽从未提出任何有关脱离格鲁吉亚的问题。他仅仅做他想做的，享受假日旅馆、热带产品并从土耳其边界走私的利润。阿巴希泽的动机看似没有公共目的，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看就像是一个小商人。俄罗斯边界驻军的主要财产从表面上看就是走私，为阿巴希泽提供了公然对抗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的保护。莫斯科政府批准这一安排，因为它限制了格鲁吉亚使其不能从俄罗斯脱离¹。

最后不得不指出，如果没有自治机构，阿巴希泽在阿扎尔的独立统治将无法实现。阿扎尔人在身份认同上分散的弱点在于无法为活跃的民族主义或是过于强烈的地方主义提供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明戈瑞利亚省份的人口有更为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²。阿扎尔的自治机构给阿巴希泽带来了权力地位，并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与格鲁吉亚其他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隔离；同时，自治共和国的政治机构和经济资源为阿巴希泽提供了在格鲁吉亚争取国家政治角色的基础。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民族结构，在阿扎尔并不存在自治会导致民族冲突的条件。然而，自治确实为当地统治者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地方领导人成功地使自己的区域免于遭受格鲁吉亚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从而建立起了更为严厉的独裁统治。

三. 结论

体制化的准备、领土自治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可能会引起预期效应相反的结果，它们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潜在冲突。正如先前所说的，自治既非冲突发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原因。但是它与少数民族的意愿、尤其是反抗能力之间有着很强的因果联系。在高加索地区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发现自治是冲突的源头之一，而非一种解决冲突之道。这一初步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自治的少数民族中分离主义很有可能要高于非自治的少数民族。这一实证研究限制在前苏联空间范围内，并且应该承认的是，在特定历史和地区的条件下依然会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这些发现或许也可以运用到其他政治背景下的相似研究之中。无论如何，领土自治机构的许多内在因素很可能在世界其他领域造成同样的结果，正如它们在前苏联中所起的作用。

不管怎样，这些发现仍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面对这一研究成果时，一位外交工作人员就沮丧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凝结着成功解决民族间冲突的希望“自治”在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且它本身就有诸多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应对民族紧张局势？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存在着普遍且简单适用的模式，而这可能就是研究意识到自治陷阱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与那些认为民族联盟是一种解决形式或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看法不同，本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种政治建构设想，即超越民族划分和其他类似的归属界线，鼓励公民认同，反对政治领域内的族群划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治方案都必然走向冲突或导致战争，而是指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避免、而且应该避免领土的族群化。

“Can Deadly Conflicts Be Prevented,” funded by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¹ Charles H. Fairbanks, Jr., “Party, Ideology and the Public World in the Former Soviet Space,” in Arthur M. Meltzer, Jerry Einberger, and M. Richard Zinman, eds.,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第 252 页.

² Cornell (fn. 34), 第 184–185 页.

本研究试图说明，通过循着民族转移权力的解决方案来决定或阻止民族冲突的主张在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在最好的情况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计划，而最坏的状况就是一个灾难性的计划。因此在多民族社会中制定民族政策时，那些很少人关注的种族联邦主义的小陷阱应该被谨记于心。

【译 文】

主权的队列： 检验苏联背景下的分离理论¹

亨利·黑尔(Henry E. Hale)著 胡萍萍译²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民族区域为了从多民族国家分离出去而激烈争斗，与此同时，另一些民族区域却为了留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而努力。文章运用了一个新的资料组来检验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解释，这个资料组包含 45 种情况，数量远多于以往任何在苏联环境下做的研究。得出的经验结果证实了一个论点：最易分离的区域是那些拥有最多财富，居住着最少被同化的民族群体以及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我们发现，示范的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能支持把群体向上流动性、技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著名理论。群体曾遭受过严重剥削的历史或民族独立经历也没有被发现能解释分离模式。

为什么一些民族区域为了从多民族国家脱离而激烈斗争，与此同时，另一些民族区域却为了留在同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而努力？这个问题分析了这个世界发生的那些翻天覆地的事件。实际上，正是一个个闹分离的共和国撕裂了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并使曾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呈现出杀气腾腾的骚乱景象。分离主义的危险并不是来源于历史场景中，然而有很多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加拿大和印度都包括了一些以少数民族界定的区域，这些区域至少会潜在地威胁到国家的统一。然而，几乎在每一个有着民族张力的国家中，我们总能发现存在民族性区域在寻求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情况。当立陶宛在 1990 年领先离开苏联时，与它相邻的白俄罗斯对于一体化的观念仍保有忠诚。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抓住机会离开南斯拉夫联邦时，黑山（南斯拉夫西南部的地方）还是继续跟着塞尔维亚在一起。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民族分裂主义³。一些理论指出区域历史的重要性，如民族受害经历可能导向独立倾向。另一些理论考核财富和发展的相对水平。还有些理论把分析重点放在了群体向上流动的前景空间中。最后，一些理论家观察着中心和边缘之间相互博弈的进程。如果这些理论中存在正确的观点，当考虑到前苏联⁴存在着这么多问

¹ 本文英文题目为“The Parade of Sovereignities: Testing Theories of Secession in the Soviet Setting”，刊载在*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2000 (Vol. 30), 第31-56页。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特别说明，我所感兴趣的是任何民族区域分离的可能性，而不在于分离是否确实发生了。

⁴ 为了避免误解，很有必要在开头说明这份研究的焦点是被官方界定的族群性区域是否倾向于分离。因此，分离社会运动只有在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时（包括他们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以及成为官方的区域政策制定者）才会进入研究视野。并不是我所检验的所有作者都清楚说明了他们的理论是把分离运用在哪儿了，是用于区域政策

题的情况时，这些理论的预测应该显示出清晰的模式。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主要理论至少有一个支持者明确宣称他或她的理论能够解释苏联众多民族区域分离倾向性的不同。因此，这篇文章是对不同解释分离的理论的检验，以前苏联的新资料组为基础，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进行分析，这使我们有可能会在先前的检验基础上有重大突破。文章会测试多达 58 个民族区域的案例，这比之前任何有关分离问题的回归分析的案例都要多，这将使我们获得更准确和更可靠的结果。

实际上，原来的许多观点是有问题的。首先，有些证据表明，最富有而不是最贫穷的民族区域是最想分离出去的。因为，如果别的群体控制了个国家，他们会被剥夺，失去的也就会最多。结果还表明，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区域倾向于运用这种自治权力来要求更多的自治，也说明通过地方分权来平息不安定区域的方式，不太可能成功。这两个结果都令人吃惊，因为很多资料与此观点相反，很多研究认为，恰恰是处于最不利境况的族群和区域是最容易分离的。另外，研究表明，当本地族群与周围文化最不相容的情况下，这个区域是最有分离主义的。研究也证实了示范效应对于促进分离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重要区域的分离行为会鼓励其他区域效仿类似的行为。

令人吃惊的另一个发现是，在分析中，有些理论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也许最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无论是在过去遭受过中央政府残忍的族群迫害还是在 20 世纪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这些历史经历都与当前的分离运动无关。另外，没有发现证据支持群体向上流动理论的解释，而莱廷 (David Laitin) 所谓的“最受欢迎的领主”所在的区域似乎与其他区域¹一样想分离。最后，研究发现，区域内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与那些区域内没有高级技能的群体一样试图分离。

我以对最重要的解释分离可能性的理论之间争论的总结作为文章的开端，进而说明苏联是一个出色的“天然实验室”来检验这些理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描述了利用数据所使用的先进统计技术（一个风险模型），然后讨论了研究的结果。

有关分离可能性的理论

当现存的相互比较的分离主义理论趋向于反映这个议题的复杂性时，最显著的一些理论归结为七个关键因素，我把它们列为区域财富、区域自治性、族群特殊性、群体技能、精英向上流动性、历史象征性资源以及示范效果。由于本文的重要工作在于验证这些理论，而不是仔细分析它们，因此我在这里只是简单重述这些理论的重要观点。

区域财富。赫克托 (Michael Hechter) 的分离主义理论是复杂的，但是他的一个关键论点是认为“一个国家中最贫穷、最不发达的民族区域最倾向于分离”。因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最依赖于联盟国家内区域间的贸易，这些区域会是最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如果经济联系²断裂了，它们会失去更多。我自己最近的理论工作，依照贝茨 (Robert Bates) 的逻辑，其结果表明事实与此观点相反：最富有而不是最贫穷的区域是最有分离主义³的。从 David Ricardo 到 Ernst Haas，

中，还是运用于群体偏好中，还是运用于分离社会运动的形成中。因此这些理论尽管没有被我验证是有效的，但可能在群体偏好或者社会运动中，这些理论仍然有一些解释力，并且，这份研究应该促进关于群体行为和区域行为之间之所以不同以及如何不同的理论发展。然而，一个人可以料到，一个能解释群体偏好的理论，也许也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群体的区域领导人会坚持这些政策。有鉴于此，在这里我检验了所有我认为能解释官方区域分离行为的主要分离理论。

¹ David D.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44 (1991), 139-77.

²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The Dynamics of Secession”, *Acta Sociologica*, 35 (1992), 267-83, p. 275.

³ Henry E. Hale, “State hood at Stake: Democratization, Seces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Robert H. Bate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 (1974), 457-84; Bates, “Modernization,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Victor A. Olorunsola, eds., *State Versus Ethnic Claims:*

理论家们告诉我们，在理论上，所有的区域都能在适宜条件下从联盟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中获利，而所有的民族区域也面临着被剥削的可能性，倘若别的族群获得控制中央政府的巨大权力，这种恐惧在民主化¹的进程中得到增强。富裕区域在被剥夺的过程中失去的最多，然而，相反的是，贫穷区域只面临着被排除在技术转移之外的危险，也可能会减少获得高附加值商品并创造有着更高工资的工作以及得到发展补贴的机会。

区域自治性。有些作者，包括赫克托（Michael Hechter）和布拉斯（Paul Brass），认为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区域倾向于提出比较温和的分离主义主张，因为这些区域的精英已经得到有效的满足了。他们在两头都获益，既可以继续开发他们自己的相对自治，也能接近联盟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因此，他们有动机来保护这种权力，并防止更加激进的分离主义²要求。比较而言，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在讨价还价的背景下检验了本地自治性，他认为这些区域倾向于运用已有的制度资源来讨价还价，他们可通过提出分离要求从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拥有更大权力的区域会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使这些要求更可信³。我最近的研究工作得到戈伦伯格（Gorenburg）的赞同，强调了制度资源在促进族群动员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围绕对自治的真正要求上，而不仅仅是特雷斯曼的讨价还价过程中⁴。

族群特殊性。大多数理论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认为自己与国家的其他区域存在族群特征的不同⁵，它越有可能提出分离要求。然而，特雷斯曼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他主张分离主义者的行为与资源的讨价还价更有关，而不是族群性。⁶

群体技能。关于民族分离主义的最有名的理论是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的理论（Subrata Mitra 同意此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多族群国家里，由最“落后”⁷的族群团体控制的区域最倾向

African Policy Dilemma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152-71. Other than these works, the “rich seceders” Hypothesis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theoretically, although several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rich Regions or ethnic groups seem to be the most secessionist. Immanuel Wallerstein makes a passing Assertion that this is true in his *Africa: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88. Timothy M. Frye finds support for Wallerstein’s claims in his focused comparison of ethnic groups in Spain,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although he does not develop Wallerstein’s argument (which itself was not elaborated theoretically). Frye’s study also does not use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ases he considers (see his “Ethnicity, Sovereignty and Transitions from Non-Democratic Ru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1992), 599-623). Milica Zarkovic Bookman notes that rich Regions often are, in fact, separatist but does not go so far as to claim that relative wealth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separatism than relative poverty (see Book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Inter-regional Conflict*, New York: Praeger, 1991)

¹ 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Peiro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1817]); Ernst Haas, “Technocracy, Pluralism and the New Europe”, in Stephan R. Groubard, ed., *A New Europe?*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1963), pp. 66-88; Haas,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 (1976), 173-212; and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²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p. 276; Paul R. Brass,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in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9-128

³ Daniel S.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 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1(1997), 212-49.

⁴ Dmitry Gorenburg, “Nationalism for the Masses: Minorit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expected 1999).

⁵ Hudson Meadwell, “Breaking the Mould? Quebec Independence and Secession in the Developed West”, in Sukumar Periwal, ed. *Notions of Nationalis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9-C61; Meadwell, “Nationalism in Quebec”, *World Politics*, 45 (1993), 203-41; Meadwell and Pierre Marti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 (1996), 1-21; Ralph Premdas,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alph R. Premdas,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Alan B. Anderson, eds.,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 12-29; Anthony Smith, “Ethnic Identity and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pp. 45-65; and Anthony Smith, ed. *Nationalist Move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⁶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p. 243.

⁷ The terms, “advanced” and “backward” groups are from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and are used here only to represent his theory clearly. No normative connotations are intended.

于分离。据说，在联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市场上，这些群体没有拥有竞争性的必须技能，因此，他们想通过分离来获得一种保护主义的优势¹。罗格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却持有相反观点，他认为理性的族群团体不会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国家，除非他们具有使国家成功运转的必须技能。因此，从这个逻辑出发，最先进的群体所控制的区域是分离主义倾向最强的。²

精英的向上流动性。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政治中心，如果族群被集体否定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族群越有可能分离。歧视程度越高，分离的倾向性越大。³相反地，莱廷（Laitin）认为一个控制了最上层流动的群体的区域领导者（他的“最受欢迎领主”）倾向于在政治自由化后立即采取分离立场。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与本地更年轻一代的精英有效竞争。这些年轻一代的精英试图通过提出分离的主张来超过老一代，由此削弱老一代的基础。

历史象征性资源。这一类资源包括两个假设，两个假设都宣称一些区域可以基于一些特殊历史经历的象征资源来提出分离要求。首先，格尔（Ted Robert Gurr）及其他人认为，曾有过民族独立的现代历史的族群最有可能将分离作为解决群体问题的手段。⁵其次，经常会这样假定，如果一个区域的本地群体曾在联盟国家的控制下遭受过巨大不公正待遇，这个区域越有可能分离，这些罪行可能包括大规模驱逐或者大范围的种族清洗。

示范效应。格尔（Gurr）注意到在动员族群怨恨中有着示范效应的传播。⁶这仅仅意味着，一个区域更有可能尝试分离，如果它的周边区域已经分离了或者在分离道路上先行采取了重要措施。这些先行者不仅减少了感知到的危险，也提供了鼓舞人心的实例，使未来这样的行动更有可能。

一个适于理论检验的极佳的天然实验室

虽然一个理想的理论检验应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案例，但是，它所要求的收集数据的巨大任务只能留给未来的研究。然而，分析苏联的案例是检验这些理论的一个出色策略，在一些重要方面，它甚至使我们避免了一些跨国比较的困难。在苏联终结的1991年，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包括了53个族群定义的行政区域。在这些区域中，一些区域实际上提出了分离的要求，同时，另一些区域没有提出分离要求，苏联政府收集了很多关于这些区域和它们的要求的信息。因此，用于检验我们感兴趣的理论的工具是现成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获得重要、精确的分析结果，这篇文章拥有的案例的数量和信息的丰富度远远足够。

实际上，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研究这么多的族群区域，使我们的结论更强大、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可信了，这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超过了跨国研究。

本文将重点放在世界上单独一个区域的做法遭到反对，因为没有考虑到不同于这个区域的来自于其他区域的相关因素，这样的研究结果只能运用于这一个区域。这应该被读者谨记，这些关

¹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165-95;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29-88; Horowitz,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Soviet Ethnic Problems",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Subrata K. Mitra, "The Rational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Sub national Movements of South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95), 57-78.

² Ronald Rogowski, "Causes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 Rationalist Account!" In Edwa Tiryakian and Ronald Rogowski, eds., *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Toward Explanation* (Boston, Mass.: Allen & Unwin, 1985), pp.87, C108.

³ Mitra, "The Rational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Rogowski, "Causes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nd Premdas, "Secessionist Movemen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⁴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p. 15.

⁵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⁶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于民族分离主义的情境变量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实际上理论没有得到发展。既然我们没有基于控制“隐藏”的情境变量的理论，那么，在没有控制情境变量的条件下去验证我们感兴趣的现存理论是危险的。除非理论发展了，能够指导我们去避免变量误差遗漏。

更重要的是，需要指出的，实际上，我所验证的所有现存理论都声称具有普遍性质，在运用上没有地域限制。如果我上面列出的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它们在解释苏联的民族区域方面也应该有效的。理论家本身最支持这一观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明确运用了他们的理论来解释苏联模式。¹他们是否说明了他们的理论能被运用或者不能被运用的条件，其中的责任在于理论家自己。由于吸引我们的理论家没有向我们提供限制性条件，我们自己也可能忽视了这些条件是否以及如何起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个研究已经而且有效地控制了可能的情境变量，这些变量很少被知，并且这些变量在跨国研究中会歪曲结论。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限制，这会让我们的结论尽可能的可信。这并不是说不应做跨国研究，而是说，在现有的理论发展阶段，重点放在苏联，会在跨国研究中占有重要的方法优势。实际上，通过在苏联的环境下验证理论，现有的研究有望加速发现并总结任何有关情境变量的过程，这些情境变量有可能影响重要的可比较理论的应用性。

在这个研究中，我使用了 45 个苏联划定的民族行政区域以及名义上的族群。我从苏联 53 个案例总量中只排除了 8 个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我去除了爱沙尼亚，考虑到接下来会讨论的示范效果，我使用了它作为起点（基线），衡量其他区域的分离主义。其次，我排除了阿扎尔自治共和国（Ajar）和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Nakhichevan Autonomous Republics）²以及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因为根据苏联全国普查的标准，它们不是被民族划定的。第三，我删去了另外三个案例，因为在恰当的年份，找不到对关键经济变量的测量。它们是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以及纳卡。最后，我略去了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因为我没有获得对它的分离主义程度的正确测量。总的来说，剩下的 45 个案例的代表性远远高于其他关于苏联分离主义的统计研究，在理论验证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³

分裂倾向的量化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晚期，在寻求自治性方面，涉及到诸多的苏联民族区域，从激情的民族主义洋溢的波罗的海国家到平静的联盟主义的哈卡斯（Khakassia）。如果观察者能清楚看出多样的模式，这个统计研究把分离主义作为可测量、可计算的单元就越容易。在埃米泽特（Kisangani Emizet）和赫斯利（Vicki Hesli）的开创性文章中，他们提出要观察每一个苏联共和国宣称主权的时间。⁴假设是：越急切的分离主义者会越早宣称主权。这很有道理，因为在苏联的个案中，一般是民族主义者为了抓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自由化所提供的时机会，推动立即宣称主权，有时

¹ Hale, “State hood at Stake”; Horowitz,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Ethnic Problems”;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Brass,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and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² 分别属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译者注）。

³ 在这里，按次序对另两篇此领域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Kisangani N. Emizet 和 Vicki L.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1995), 492-536) 只考虑了 15 个在苏联统治集团中最高层级的加盟共和国。包含前苏联其他民族区域，不仅给了我们更多的信息，而且也能使更精确的判断成为可能。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将他研究的案例范围限制在了俄罗斯联邦内部，因为他对于苏联解体后这些区域的行为更感兴趣。聚焦于后解体（post-collapse）行为，他被迫排除了不以俄罗斯联邦作为优先选择的区域案例。为了验证我们所感兴趣的相互比较的分离主义理论数据，需要苏联时期充足的数据，however, lessening the impact of this sacrifice for our purposes. 另外，聚焦于更少的案例，Treisman 失去了一些信息，也牺牲了结论的准确性。尤其是，他失去一些自变量的变化，如财富，通过排除最富有的苏联区域如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最贫穷的中亚区域。这很重要，因为，在相类似的共和国之间，整体或特定变量上将会因为个案太少而难以归结出变异性。因此，包括前苏联的案例，现有的分析代表了对先前研究的重要进步，尽管它包括一些对 Treisman 方法的借鉴。

⁴ Emizet and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甚至从联盟中退出。重要的是，一个共和国宣称主权，并不必然表示它首选分离，也可能宣称它将以自己的方式留在联盟里，然而对于那些想要完全分离的区域，这通常是在通往独立的路途中采取的第一步。因此，最热心的分裂分子倾向于最早宣称主权，

当加盟共和国确信宣称主权只是意味着在重建联盟的协商中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就会有更多的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因为，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和自治区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宣称主权，因此，它们做这样事的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运用于每一个案例的测量方法。既然这涉及时间（timing），这种测量方法也使我们能验证示范效果，一个区域宣称主权会鼓励其他区域效仿。很多观察者，例如，格尔（Gurr）已经注意到这些效果（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重要性，通过将它们考虑在内，这种测量分离主义的方法优于很多统计方法。¹

当然，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例如，一个人可以想象，在一个案例中，两个支持独立的派别主导了一个共和国的领导权，但是两个派别在独立形式上分歧很大。这样的话，在主权宣称内容上的争斗会延迟宣称本身。因此，时间，也许反映了程序性限制或者与独立程度无关的次要议题。然而，这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这些条件可以视为毋庸置疑的大量随机事件，它们使得所有的统计研究具有不确定性。²我们的研究看起来只是为了广泛的倾向性，宣称主权的时期模式仍然应该能反映出这样的倾向性。第二，当分离主义情绪强烈时，次要议题或程序议题的延迟不应是经常发生的。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围绕最初的主权宣称，然而，随后他们会陷入经常性的争斗中，因为他们不得不决定主权的形式。另外，主权宣称的一般模式确实与观察者对于分离主义倾向最强的共和国的一般印象相一致：波罗的海国家率先，联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宣称主权明显较晚。³

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采取了“主权宣称”。在一些案例中，采取的是法律上的主权（laws on sovereignty）或者一系列法律在主权宣称之前被采纳。主权宣称的要素在于声称一个区域的法律在本地优先于联盟法律，并且这种权力只能被自愿的放弃。记住这一点，我跟随着 Emizet 和 Hesli，将正式声称主权作为第一步的官方行动。这儿，我没有把区域从自治区域上升到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上升计算在内，除非这些行动能被称为主权宣称。⁴

我测量了主权宣称的时间，把第一个宣称主权的区域（爱沙尼亚）定为零点，原因在下面说明。⁵因此，我的因变量是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晚于爱沙尼亚几周。我的观察期结束于苏联 1991 年 8 月政变后的第 144 周，那时只有六个族群区域还没有声称主权。⁶这份研究把这六个在第 144 周没有宣称主权的区域考虑进去了。⁷

因为我使用“主权检阅”作为一个指标，我在回归中包括了一个变量（1989 年人均消费品生产）来控制被巴尔利（Donna Bahry）定义为对这些事件的独特影响。⁸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

¹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² 假设它们与自变量、因变量不是系统一致的，否则偏见会产生。

³ 初看，车臣似乎是个例外，但是这主要指出了这份研究没有考虑共和国政治变化的事实。实际上，在我们所感兴趣的这段时期，车臣确实在追求一种相对的联盟主义。苏联在 1991 年 8 月的失败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紧跟此事件，苏联将军杜达耶夫（Djokhar Dudaev）在车臣夺权并迅速动员大众支持激进的分离主义政策，当时的特殊环境也促进了事件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一个人认为宣称主权的时间会错误的测量车臣这个案例，这并不会大幅度的改变研究结论。当把车臣作为与立陶宛（仅次于爱沙尼亚的最想分离的区域）分离程度相同的区域，统计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

⁴ 然而，这些案例的编码与我们的结果无关。在这四个案例中，如果我把“地位上升”作为主权宣称，关于财富和分离主义之间相关的置信度会下降到 93% 水平，略低于我们通常所用的 95% 统计置信度。同化变量也类似的下降到 91% 的置信度水平。涉及到的 4 个案例是布里亚特自治区，犹太自治州，哈卡斯和莫尔多维亚（Mordvinia）。

⁵ 然而，我的确运行了一个包括爱沙尼亚案例的回归，使用了 1988 年夏天第 19 次党会作为苏联自由化的起点，计算一个特定共和国在这个事件过去几周后才宣称主权，即我的因变量。在结果上没有大的变化。

⁶ 它们是布里亚特自治区，犹太自治州，哈卡斯和莫尔多维亚（Mordvinia）。

⁷ 也就是说，这些值被认为是删节的。

⁸ Donna Bahry, “The Union Republics and Contradictions in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7

政策使当地领导在本地为消费品生产负责，同时否认他们有效管理的权力，因而促使享有最多消费品生产份额的共和国最早宣称主权。

统计方法

选择一个合适的统计模型

大多数统计研究都假设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偏离一般会围绕着这条线。我的因变量是，如上面所说，爱沙尼亚宣称主权之后，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所花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持续时间（duration）。这意味着我们感兴趣的因果关系不能被适当的模拟为线性的。如 Gary King 和其他人认为的，当研究持续时间时，使用线性方法（最小二乘法，OLS）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由于定义，持续时间由零值开始，因此取值总是正的。¹一个线性关系可以预测出负值，而这对于持续时间没有任何意义。考虑到极值，线性模型很有可能（尽管可能性不大）在它还没有产生之前，预测出一个区域将要宣称主权。这暗示，在持续时间中运用线性模型不是有效地，因为它没有利用所有可能的信息，没有考虑到潜在的干扰因素和正确的函数形式。²

为了强调这个问题，在 Emizet 和 Hesli 分析介绍中，我使用了一个“持续时间模型”。³这是一个专门的统计技术，研究一个事件如主权宣称的发生所需要的时间。它也被称为“风险模型”，这些方法在政治科学中日益受欢迎。⁴尽管有各种持续时间模型，我使用了一个 Weibull 分布。既然这个理论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我在这儿只简单说明。⁵

考虑到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得很好，Weibull 模型最强大的地方，也是与其他持续时间模型相反的地方，就是时间依赖参数的预估。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使我们能够评估，在苏联晚期，在何种程度上，随着时间推移，时间是如何使主权宣称更有可能的。在下面的结论讨论中，时间依赖参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会更清楚。下面的等式中，时间依赖参数可表示为 p 。当 $p < 1$ ，存在负的时间依赖，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事件（如一个主权宣称）越不可能发生。当 $p > 1$ ，时间依赖是正的，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事件越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预计持续时间缩短）。⁶

时间持续模型一般被表述为三种方式：作为一个风险函数（ $\lambda(t)$ ：一个事件在某个时间点 t 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生存函数（ $F(t)$ ：在一个特定时点之前事件不会发生的可能性）；作

(1991), 215-55.

¹ Gary King, "Statistical Models for Political Science Event Counts: Bias in Convention procedures and Evidence for the Exponential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1988), 838-63, p.851; Gary King, James E. Alt, Nancy Elizabeth Burns and Michael Laver,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1990), 846-71, pp.845.

² King, "Statistical Models for Political Science Event Counts", p.84.

³ Emizet and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⁴ One of the most recent and methodologically rigorous studies is D. 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 Stam III,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 1816-198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1996), 239-57. Other political science applications include Joel S. Heliman, "Competitive Advantage: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Post communist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1996), and several studies of how long leaders or governments remain in power: King et al.,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Henry Bienen and Nicholas van de Walle, "A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of Leadership Du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54 (1992), 685-717; and Paul Warwick, "Economic Trends and Governmental Survival in West Europe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875-887.

⁵ For a discussion of duration models, see articles in the previous footnote as well as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and Bradford S. Jone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Event History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97), 1414-61; J. D. Kalbfleisch and R. L.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New York: Wiley, 1980), pp. 23-4, 30-54-5; and William H.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717-718, 7217-22.

⁶ 这篇文章使用的数据组包括一个持续时间，相应于所研究的 45 个民族区域中的每个。测量自变量的时间是 1988 年，这时测量的持续时间都开始，或者是对此点尽可能靠近的年份。除了下面的一个特例，我没有包括时间持续研究中有可能已发生的自变量值的变化，这些变化一般被认为不重要或不存在。

为一个概率密度函数 (f(t) :事件发生的时间分布, 有时被可怕的称为死亡密度函数)。¹我们按照 Greene、Kalbfleisch 和 Prentice² 那样假设, 自变量 χ 与期望持续时间 λ 通过指数 β 相关:

$$\lambda_i = e^{-\beta x_i}$$

不巧的是, 这个函数作为持续时间模型好的方面是, 它总是正的。Weibull 条件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lambda(t; x_i) = \lambda(p)(\lambda t)^{(p-1)} e^{-\beta x_i}$$

Weibull 条件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f(t; x_i) = \lambda(p)(\lambda t)^{(p-1)} e^{-\beta x_i} \exp[-(\lambda t)^p e^{-\beta x_i}].$$

Weibull 条件概率密度函数是“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特例, 自变量 χ 在因变量上的乘法效应取决于风险函数的一个“起点” $\lambda_0(t)$, λ_0 被定义为

$$\lambda_0(t) = \lambda(p)(\lambda t)^{(p-1)}.$$

当风险起点是随机的、不确定的, 在这个案例中, 它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区域被剥夺了所有的识别特征后会宣称主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在我们感兴趣的时期内, 有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是风险), 任何民族区域都有可能因为一些随机原因(例如领导者的突发奇想)而宣称主权, 尽管我们感兴趣的自变量 χ 使主权宣称或多或少的像上面的函数所描述的那样。

拟合值可以这样表示:³

$$e^{-\beta x_i^*} \Gamma(1/p + 1).$$

如何最好的解释 Weibull 结果

Weibull 结果允许我们很容易的进行判断, 例如, 是否越富有, 主权宣称得越快。这个模型给每一个自变量产生了一个系数。如果这个系数是正值, 我们知道, 在宣称主权前, 自变量值的增大与更长的时间相联系(也就是说, 它们与更低水平的分离主义相联系)。与标准 OLS 回归一样, 我们可以轻松地计算出这种关系发生的可能性不是随机的。

这只是说财富是有影响的, 然而, 却没能告诉我们这种影响有多大。不幸的是, 这种影响规模不能由 Weibull 模型直接得出。这是因为, 如之前所说的, 影响一个区域何时宣称主权的因素 x_i 不是线性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数据中看到影响因素 x_i 的效果有多大。实际上, 如上面公式所表示的, 两个变量之间是指数关系, 并且被时间依赖参数所修正。一个自变量的影响可以因时间变化而变化, 也因另一个自变量值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 测量一个特定因素效果的最好方法是, 进行一系列社会实验。当我们最初在统计分析中加工所有信息时, 这个分析不仅告诉了我们, 是否不同的解释因素与宣称主权时间相关, 而且还在给定的信息基础上, 产生了一个能很好预测主权宣称时间的模型。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信息, 模型会在新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系列新的预测。这允许我们进行很多反事实的练习。例如, 为了检验财富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可以把最富有的民族区域变为最穷的民族区域, 同时保持其他的因素不变。由此导致, 模型所预测的区域宣称主权所需时间长度会产生变化,

¹ This paragraph draws primarily on 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pp. 23-4, 30-2, 54-5; Gree *Econometric Analysis*, pp. 717-18, 721-722; and Benne and Stam, “The Duration Interstate Wars”, pp. 244.

²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³ 这个表达式不同于一些其他文章, 例如 Greene, *Economic Analysis*; 但是, 大家一致认为它是正确的, 甚至是 Greene 自己(详见 Benett 和 Stam,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

这使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财富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的效果有多大。在一个真实区域里，以系统的方式使重要变量的值发生变化，¹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真正效果是怎样的。

结果

结果强有力的支持了所检验的一些理论，同时，另一些理论在理论解释力上有局限性。

表格 1 统计分析的主要结果说明：因变量是一个苏联的民族区域宣称主权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在爱沙尼亚 1988 年 11 月宣称主权之后还用了多少周的时间。系数的负号意味着随着变量值的增加，一个区域宣称主权所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我解释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增强（N=45）。

2005 年本地大学学生注册

因子测试	系数	解释
区域财富	- 0.430084**	增强了分离
区域自治性		
AO	0.4875974**	增强了分离
ASSR	0.2528836*	
族群特殊性	- 0.006855*	不显著
群体受教育水平	- 0.0016567	不显著
精英集团流动性	- 0.0172058	不显著
独立历史	- 0.2320993	不显著
曾被苏联当权严重迫害	- 0.0799936	不显著
示范效应：俄罗斯宣称主权	- 0.445922*	增强了分离
时间依赖水平下的示范效应	$p = 4.478406$	随着时间流逝，主权宣称越有可能
生活消费品的生产	- 0.2086687*	增强了分离
常数	6.058973	——

* 通过 95%统计显著性检验。 ** 通过 99%显著性检验

从表格 1 和表格 2 可以看出，最分离的民族区域可能是经济最富有，居住着最少被同化的民族群体，已经拥有最多自治权的区域。并且，结果证明，强示范效应在起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分析没有支持这个观点：分离的倾向取决于政治中心中（最受欢迎的领主地位）族群向上流动性。结果也质疑了这个看法：族群会基于他们掌握的技能而理性计算是否分离。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统计分析还总结出：有过民族独立的历史经历以及在中央政权下受过残忍的迫害的历史经历并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些共和国比其他共和国更分离。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讨论，对应于我所验证的每一个理论，统计结果表明了什么，然后再回到结论部分更广阔图景中。

区域财富

统计分析显示，高财富水平与强分离主义之间高度相关，结果与我之前的观点相一致，与贫穷的区域相比，如果富有区域继续留在一个联盟国家内，它会有更多的恐惧，得到的更少。在苏联晚期的特殊情境下，为了量化财富，我使用了 1988 年测量的人均零售商品营业额。²在一个详尽的统计研究中，德米特耶娃（Dmitrieva）认为，其他国家通常用来代表财富的指标被苏联指令性经济的情境严重扭曲了。³她挑选出零售商品营业额作为测量生活标准最准确、最敏

¹ 这篇文章提高或降低了一些特定变量的值，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区域以一系列不同的自变量值为起点。

² 我没有使用 Emizet 和 Hesli' s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测量自变量的方法是因为以下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测量方法只能用来测量十五个联盟共和国，而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其他三十个案例。第二，他们分类背后的逻辑以及选择的指标并不清晰，而且与我感兴趣验证的理论不是直接相关的。第三，他们没有在研究中明确区分出民族群体和共和国。例如，他们将社会发展作为测量一个群体先进或落后的指标，涉及到整个共和国人口（不仅是民族群体）居住在城市区域的比重。最后，他们有时在同一个指标中混合变量和变量的变化速率，然而它们不一定同时变化，也许也反映着不同的东西。我也尽力避免了他们使用的很多指标，因为他们使解释大大复杂化了。我使用了很多与 Treisman 同样的测量方法（'Russia' s "Ethnic Revival" ），尽管他的一些测量方法不适用于我感兴趣的时间段里的苏联一些区域。

³ Oksana Genrikhovna Dmitrieva, Regional' naya Ekonomicheskaya Diagnostika (Saint Peters-burg:

感的指标，因为它反映了生产水平和消费者对物品的需求。¹看这些结果，我们可以自信的说，这个财富指标与宣称主权的时间是相关的。这个结果不是随机的可能性小于 4%，远远超过了统计通常要求的 95%的置信水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表格 1 中看出，系数的符号是负的，这意味着富有区域倾向于最早宣称主权，支持了黑尔（Hale）而没有支持赫克托（Hechter）。我们把零售商品销售额替换为别的测量区域财富的指标（人均服务量，人均医生数），这些结果仍然存在，尽管不是所有这样的指标（城市化，人均医院数）都被证明是与宣称主权的时间高度相关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上面所认为的，最能反映理论逻辑的变量（零售商品营业额）实际上是与宣称主权的时间高度相关的。总的来说，结果支持这个假设：贫困往往会限制族群区域从多民族国家分离。²

表格 2 所检验变量的独立影响：一些模拟社会实验³

(a) 相对财富	拉脱维亚的水平 (1.86)	白俄罗斯的水平 (1.41)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0.68)	最大值-最小值的变化%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财富水平：				
拉脱维亚（富有）	38 个星期	46	63	66
白俄罗斯（代表性）	46	56	77	55
塔吉克斯坦（贫穷）	51	61	84	40
(b) 区域自治性	对于 SSR	对于 ASSR	对于 AO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等级：				
拉脱维亚（SSR）	38 个星期	49	62	63
塔吉克斯坦（SSR）	84	108	136	62
鞑靼（ASSR）	68	88	111	49
Ust-Orda 布里亚特（AO）	77	99	125	38
楚克奇（AO）	62	80	101	39
(c) 族群特殊性	格鲁吉亚的水平 (98.2)	白俄罗斯的水平 (70.9)	Evenkia 的水平 (30.4)	
如果我们调整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 个星期	71	94	59
白俄罗斯（低）	47	56	74	48
埃文基 Evenkia（非常低）	89	107	141	37
(d) 群体技能	格鲁吉亚的水平 (17)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7)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1 个星期	60.1		2
塔吉克斯坦（低）	82.7	84		2
(e) 精英向上流动性（MFL）	格鲁吉亚的水平 (1.24)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0.32)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1 个星期	60		2
塔吉克斯坦（低）	82.7	84		2
(f) 曾独立过的历史	有过独立	没有独立过		
拉脱维亚	38 个星期	48		26
乌兹别克斯坦	65	81		20
(g) 受害的历史	受过迫害	没有受过迫害		

Izdatel' stvo Sankt-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 Ekonomiki I Finansov, 1992), pp.130-2.

¹ 她也使用了医生数和人均病床数作为社会发展（她将此等同于生活标准）的合理指标，尽管认为这些不是敏感指标。她所写的与社会发展一些指标相关的、从理论上得到证明的另一些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并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使用。See Dmitrieva, Regional' naya Ekonomicheskaya Diagnostik, pp.116-17.

² 这为 Treisman' s (“Russia' s ‘Ethnic Revival’ ”) 怀疑二者关系重要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统计支持，即使他自己的统计研究没有包括足够多的案例来产生统计显著的结果。Treisman 对财富和区域分离主义行为之间关系的解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富有区域直接参与世界市场，因此能对分离产生更可信的威胁，所以，富有区域能向中央索要更多的资源。

³ The substantive significance of Tested Variables.

拉脱维亚	38 个星期	41	8
乌兹别克斯坦	75	81	7

说明：使用统计分析生成的模型，这个表格表明了重要解释因素的影响。例如，(a) 部分记录了相对财富方面的影响力变化。在第一排，我们理解了如果把拉脱维亚变贫穷后会发生什么。最初，我们预测拉脱维亚会在时间零点（爱沙尼亚宣称主权的日期）后的第 38 个星期时宣称主权。如果我们把它的财富水平降低到像白俄罗斯（它是 1.41）一样，我们预测拉脱维亚会在 46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如果我们把它直接降到塔吉克斯坦的财富水平上（0.68），爱沙尼亚会在 63 周后宣称主权。最后一列是表明实验后，拉脱维亚宣称主权所用时间产生的总体变化是 66%。

财富不仅会使一个区域更分离，并且它会使该区域的分离程度比以前提高很多。在表格 2 中，我叙述了研究对于财富效果的估计，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像上文统计方法部分描述的那样，将这个表格放在一起，在定量世界，我展示了一系列模拟社会实验。首先，我做了 Stalin 也许曾经想做的，从苏联两个最富裕的区域挑出一个区域，拉脱维亚，使它完全贫困，降低到塔吉克斯坦的贫困水平。根据我们的模型，“贫穷的拉脱维亚”在 63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与“富裕的拉脱维亚”在 38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的情况相反，晚了 66%。然后我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使塔吉克斯坦达到与拉脱维亚同样的富裕水平，与贫穷的拉脱维亚用了 84 个星期宣称主权不同，“富裕的拉脱维亚”只用了 51 个星期。这样的变化使塔吉克斯坦从“晚期分离者”的队伍进入到急切分离者的范围。这些以及其他模型的检验证明了，财富确实对分离主义有重要的决定作用。¹

自治性

一个区域已有的自治程度与提出分离主义的宣称之间高度相关。在苏联，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等级的民族政治单元，每一个等级都反映了一个不同的自治水平和一系列不同的制度资源。

“加盟共和国 (SSRs)” 等级最高，仅低于苏联中央政府，拥有最全的机构，包括大学和科学研究院。当苏联在 1991 年垮台时，是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国家。低一点的等级是“自治共和国 (ASSRs)”，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等级最低的是“自治区和自治地区 (AOs)”。它们通常（尽管不总是）附属于一个加盟共和国。由于不知道行政层级下的两个等级是否对分离主义有同样大的影响，因此，我采用了两个虚拟变量，相应于每一个层级的下降，以便能检验出自治性的影响，并分别估计它们的参数。

如特雷斯曼 (Treisman) 的讨价还价假设所预测的那样，最高等级的区域会做出最具有分离主义的宣称。不同于布拉斯 (Brass) 和赫克托 (Hechter) 所预测的，这些区域不仅不会被更多的自治、制度资源抚慰，反而会使用这种权力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力和制度资源。特雷斯曼认为这有道理，因为，最有权的区域最有能力使分离要求可信，迫使中央领导用补贴或其他资源来安抚它们。实际上，我的这份研究而不是特雷斯曼自己的统计工作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因为现在的分析包括了三种水平的自治（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而特雷斯曼自己的研究只包括了后两个。然而，这些结果与戈伦伯格 (Gorenburg) 的制度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他没有考虑讨价还价行为的重要性。根据他的解释，最高等级的共和国是最反叛的，不单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紧跟来自莫斯科的资源，而且拥有很多资源来追求这些目标，并且由于这些共和国有着一系列强大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培养族群认同，有利于在苏联时代动员民族主义情绪。

如表格 2 所呈现的，这种力量的效果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将拉脱维亚从加盟共和国下降到

¹ 我的统计软件 Stata 不允许我从时间变化的协变量 (TVC) 数据中得到预测（看接下来在“示范效果”中的讨论，会明白为什么这个脚注在这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只对每个自变量的影响有多大感兴趣，而不是对能进行最准确预测的模型感兴趣，我是这样编码的，对于非 TVC 模型能预测出的会在俄罗斯之前宣称主权的所有共和国而言，把俄罗斯是否已经宣称主权的变量编码为 0，剩下的编码为 1。因此，对于早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共和国，在拟合值上没有失真（拉脱维亚、立陶宛）。对于那些晚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共和国，所预测的宣称主权所需的时间要低于一个 TVC 模型能预测的，因为这些区域被假定从一开始就是受俄罗斯示范影响的。在所有案例中，我们对于待检验因素的相对影响的预测都不应受到威胁。

自治区，我们的模型会显示出，拉脱维亚自治区在 62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而不是原先预测的 38 个星期，晚了 63%。同样的，如果我们将偏远的西伯利亚的楚克齐（Chukchi）自治区提升为楚克齐加盟共和国，它只用了 62 个星期宣称主权，不像最初预测的 101 周。因此，这样的变化使主权宣称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多。

族群特殊性。

族群特殊性似乎是苏联分离主义的基础。因为，语言一般被认为是族群特殊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当然，有一些明显的特例），我把 1989 年苏联全国普查中宣称族群语言是本地语言的族群比例作为测量同化程度的标准。根据统计结果，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越少被同化到周围文化中，该区域越想分离。这个相关关系有超过 95% 的可能性不是随机的。这与特雷斯曼的发现相矛盾，他以更少的案例说明这些因素与分离主义行为是无关的。

现在的研究不仅证明族群特殊性是重要的，而且也显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为了证明这些影响的显著，我再次使用了 Stalinist 社会实验假设。首先，我选择了格鲁吉亚，超过 98% 的人口宣称格鲁吉亚语是它的本土语言，除了族群人口的 30%，我把它全部同化。被同化的格鲁吉亚现在与埃文基（Evenk）自治区域同化程度一样，仅有 30% 的埃文基人宣称埃文基语是他们的语言，这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模型生成的值，格鲁吉亚用了 94 周而不是 59 周宣称主权，晚了 35 周，将近 60%。将埃文基的同化水平提升到像格鲁吉亚一样高，会产生了一个类似的但却是相反的效果，这可以从表格 2 中看到。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族群特殊性转到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殊性时，结果却让人震惊。一个区域是否包括非常多的俄罗斯人口似乎并不重要，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一般认为，大量的俄罗斯人口会减慢或者试图妨碍一个区域从俄罗斯母体中分离出去。然而，结果显示，拥有大量俄罗斯人口的区域将同被少数民族主导的区域一样倾向于分离。尽管统计分析时我们不能确信俄罗斯人口是重要的，但是，“Weibull 系数”的符号表明：越多的“少数民族”意味着越分离。

群体技能

统计分析没有支持这个理论：在区域做出是否退出的决定中，族群的精英技能起着重要作用。如之前描述的，Horowitz 认为拥有精英技能的团体更希望留在一个联盟国家里，然而 Rogowski 认为这些群体是最分离的，因为它们可以建立独立国家。既然群体中的大部分是通过教育获得他们的精英技能，所以，我用 1989 年 15 岁以上的联盟国家人口中，族群受到更高教育的人口比例来量化这个变量。结果更支持 Rogowski 的理论而不是 Horowitz 的理论，因为 Weibull 系数的符号是负的，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早宣称主权。¹但是，即使一个人认为更多的案例将会显示这个关系不是随机的，真实环境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能会特别小。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格鲁吉亚人，把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降低到与接受最少教育的群体一样，如塔吉克斯坦人，结果只是导致格鲁吉亚宣称主权时间的晚了仅仅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将塔吉克斯坦人的教育水平提高，得到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与财富的影响相比，群体受教育水平并不是苏联分离主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精英向上流动性

这份研究表明，区域领导在谋划分离时，没有考虑到族群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性。为了测量一个特定族群在中央政治、经济统治集团中提升的程度，我主要使用 1989 年每个族群在共产党中的代表性作为标准。共产党的成员身份被认为是获得苏联精英职位所必须的条件，

¹为了验证 Rogowski 基于技术的国家生存能力理论，我不仅使用了“群体受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指标，也使用了区域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作为指标，因为国家生存能力也许依靠的是区域整体的一系列技能而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本地族群。结果表明，这个指标与主权宣称也没有统计显著性，实际上，当用区域受教育水平代替群体受教育水平时，系数的符号改变了。这表明，区域受教育水平越低，分离主义程度越高，这与 Rogowski 预测

并且，共产党的确包括了诸多经济和政治精英。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变量与主权宣称的时间有显著的统计相关。这对霍洛维茨（Horowitz）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群体他们自己的区域之外无法向上流动，他们会想要离开那个联盟。结果也不支持莱廷（Laitin）的“最受欢迎领主”理论，他认为享有最受欢迎领主地位的群体会在其他群体之前走向分离，因为更年轻一代的精英会在独立的议题上试图超越老一代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莱廷（Laitin）理论的证据超过支持霍洛维茨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理论的证据，因为系数符号是负的。这意味着在共产党中（也是向上流动性）拥有最多代表性的群体会越早宣称主权，这也是莱廷（Laitin）预测的。

即使有人认为更多的案例会显示出这种关系不是随机的，然而，研究清楚的表明，向上流动性对苏联分离主义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小。表格 2 显示，如果我们再次使用反事实的社会实验，把格鲁吉亚人，从最受欢迎领主地位、最有向上流动性的群体降低到最少向上流动性的群体，如塔吉克斯坦人，我们会发现，格鲁吉亚共和国只多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宣传主权，由 59.1 周增加到 60 周，这个变化小于 2%。相反的，如果我们把塔吉克斯坦人赋予格鲁吉亚人的向上流动性，我们得到的影响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如果将此与财富影响的程度相比较，向上流动的重要程度明显是很小的，因为，财富使分离主义在原来水平上上升了三分之二。

为了确信这些结果不是因为错误选择了经验指标带来的人为后果，我对每一个群体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性都进行了检验，不论是高代表性还是低代表性。因为新的选举制度可能已经影响了共产党的重要程度，因此，我考虑了 1989 年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以及 1984 年在前戈尔巴乔夫苏联政体下非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议会）中的代表性。在莱廷（Laitin）的建议下，我也在他最近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尝试了该变量一系列其他排列方法¹。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使结果发生重大改变，尽管使用的人民代表大会指标改变了 Weibull 系数的符号，与霍洛维茨（Horowitz）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更一致，而不是与莱廷（Laitin）一致。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精英向上流动和区域分离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曾独立过的历史和曾受过压迫的历史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支持了一个普遍的猜想：有过引人注目历史的区域最可能分离，如民族独立历史或者民族受害历史。首先，我验证了在被苏联控制之前，一个苏联共和国是独立国家的事实是否重要。在苏联的 45 个案例中，这个类型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图瓦，在 1940 年代被吸收进苏联之前，它是一个独立国家。²

另外，我包括了一个较宽泛的分类，分类里涉及历史上只有简短、不重要独立经历的区域或者加入苏联远远晚于其他区域的区域，有波罗的海共和国、图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其次，我验证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族群曾遭受过大范围的族群驱逐的区域（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evo-Cherkessia]），或者，被强行入侵的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是否会比其他区域更趋向分离。我也尝试了另外两种分类方法，增加了一些区域，这些区域的主要群体中有很多人曾经由于苏联的政策而死亡，例如 1930 年代早期的大饥荒。³

的结果相反。

¹ 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的私下交流中，莱廷（Laitin）提到，最受欢迎领主地位和分离主义之间的关系也许是非线性的，因为，高水平 and 低水平都会比中等水平更联合。所以，我验证了测量群体高代表性和低代表性的绝对值（0 意味着一个群体既不是代表名额不足也不是代表代表名额过多），结果仍然不显著。由于莱廷（Laitin）的中间（“integralist”）分类似乎只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我尝试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包含一个互动变量，在其他区域用了最受欢迎领主指标。

² See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Tuvan case.

³ This category includes the Baltic states, Kalmykia, Karachaevo-Cherkessia, Chechnya, Armenia, Moldova, Ukraine, Kazakhstan, Turkmenistan, Kyrgyzstan, Buryatia, Yakutia, Evenkia, Khanty-Mansiisk and Chukotka. Victimization data are from Aleks and rNekrich, *The Punished Peoples* (New York: Norton, 1978), and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我们吃惊的是，在苏联晚期，在这些变量当中，没有任何变量与主权宣称时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总体来说，受过严重民族罪行（例如，大量驱逐或者征服）的区域与没有受过这些剥夺的区域相比，并不会更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这是现实的事实，不管使用多宽泛或多狭窄的关于“独立”或“受害”的定义。更多的案例也许会证明受害与区域分离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这一点至少可信。系数的符号如预测的方向一样（它们是负的），过去的独立或受害经历会使区域更快宣称主权而不是更晚宣称主权。另外，这些效果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拉脱维亚在 1991 年之前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表格 2 预测，拉脱维亚会比预期的宣称主权的时间晚 26%。然而，受害经历的效果会小些。如果拉脱维亚没有在苏联控制下遭受大规模驱逐，它宣称主权的时间只会比原来晚 8%。重申一下，这份统计研究使我们无法相信这些关系只是随机的。

示范效应

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苏联的“主权队列”中，示范效应起着作用。我会用两种方式展示这一点。首先，由于俄罗斯在规模和集中性上的优点，在理论上，俄罗斯被认为对其他共和国有着最强的示范效应¹，我使用了一个虚拟变量，它随时间变化着，把俄罗斯宣称主权后的时期编码为 1，宣称主权之前的时期编码为 0²。重要的是，把“俄罗斯示例”作为一个变量，我们可以直接验证它的统计显著性，因为要估计它的系数。验证的结果表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确实有影响，似乎会使其他的共和国提前几周宣称主权。³这种影响看起来还很大。⁴例如，如果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同时宣称主权，我们的模型预测，拉脱维亚将会只用 24 周宣称主权，不是原先预测的 38 周，在主权宣称时间上减少了三分之一多。

我证明“传染”确实存在着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时间依赖参数”， p ，这在上面的方法部分讨论过。重要的是，这个参数的估计值远大于 1。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要承认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但仍然有理论依据断定，时间依赖参数可以合理模拟出我们感兴趣的示范效应。实际上，在早期宣称主权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莫斯科镇压的危险会减小，这一点越来越清晰，苏联领导们不会动用武力，也不会用暴力平息这些运动。主权概念不断上升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时间函数。

俄罗斯（由于它的规模）和爱沙尼亚（由于它是第一个宣称主权和破冰的）分别对宣称主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两个共和国扭曲了时间和示范效应之间的关系。如前一段所描述的，我通过把俄罗斯直接纳入到研究中来控制俄罗斯这一个案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精确地发现，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in particular p. 101.

¹ The argument that Russia declaration had a huge impact has been made by Gail W. Lapidu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Perestroika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apidus and Victor Zaslavsky, with Philip Goldman, ed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5-70, at p. 59); and also by Gwendolyn Stewart, who has illustrated this well in an unpublished graphic provided to the author.

² 自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资料组是一个 TVC（时间变化的协变量）资料组。看 Bennett and Stam,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作为 Weibull 回归中使用 TVC 的一个例子。

³ 然而，“传染”对于我们是否确信变量是否在起作用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变量以 5% 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了 TVC 回归和非 TVC 回归。增加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确实对于估计自变量系数的大小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在大多数案例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当我们由非 TVC 资料组转到 TVC 资料组中，TVC 回归的影响几乎增加了一倍。重要的是，这表示，这个模型所没有控制的任何类似的传染效应都不会影响我们判断我们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俄罗斯主权宣称的效应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共和国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重大结果的发现，都会引人注目，在发现之外包含着各种噪音。这些非俄罗斯示范效应的存在，也会阻碍我们发现系数的真正大小。由于 P 参数在 TVC 模型中很小，也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和国范例的积累，结果显示，时间依赖参数反映了传染效应的大部分。

⁴ 接下来的段落会解释，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会使时间依赖参数减少一半，表明在这份研究中，俄罗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如果时间依赖参数反映了传染效应并且俄罗斯对于主权的宣称有足够大的示范效应，那么在嵌入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后，时间依赖参数的估计下降了一半。我使用爱沙尼亚宣称主权的时间作为我测量持续时间的起点，以此来控制爱沙尼亚的开创性举动¹。因此，这样来谨慎地解释 $p > 1$ 的时间依赖参数结果，我确信示范效应对于鼓动苏联分离主义很重要。

结 论

这份统计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高财富水平、低同化程度以及高度自治水平会促使一个以族群界定的区域更快地宣称主权。这篇研究证实了我早期的观点，我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联盟国家内，富裕区域是最倾向于分离的，因为如果其他群体获得了控制国家的权力并且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权力，富裕区域会失去的将会最多。而且，如贝茨 (Bates) 所说的“现代性产品”，贫穷区域如果继续留在一个联盟里，它所得到的也最多。研究结果增强了特雷斯曼 (Treisman) 观点的可信性，即很多分离主义行为可以用中心和区域在资源上的讨价还价过程来解释。通过在统计分析中包括三个而不是两个水平的自治性，目前这一研究比特雷斯曼 (Treisman) 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他假设，已有的自治性水平越高，民族主义的激进程度越高。这个结果与戈伦伯格 (Gorenburg) 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他认为，在区域分离主义的背后，真正激起了社会需求的是制度，而不仅是中心-边缘的讨价还价。研究结果确证，在苏联晚期，族群独特性和示范效应有力地影响了民族分离主义。

有一个发现最令人吃惊：当把区域富有、自治性、族群独特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后，族群是否有过独立历史以及受迫害历史，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民族分离主义水平上的不同。这表明，族群团体并不必然会由于不幸的过去而与四邻陷入永久的敌对状态中，因为物质方面的考虑会使区域领导人不去启用“分离主义”的符号作用，甚至是在危机时期。

这份研究指出，研究者需要在更广阔的情境变量下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工作，这也许展示了一个特定的观点也许会在很多国家起作用，但却在另一些国家不起作用。尽管一些理论得到了很强的支持 (Gorenburg 的理论、我自己的理论、Treisman 的理论)，产生出一般性的结论，利用了比较广泛的政治传统，但是，它们只能被严格运用在 (前) 苏联案例中。参照苏联晚期的情况，莱廷 (Laitin) 的观点也得到发展，其他人也明确说明他们的观点只能用来解释苏联案例。在这儿，不被支持的大部分主要理论 (Brass、Hechter、Horowitz 以及 Rogowski) 却在非洲、亚洲以及/或者西欧案例中得到了发展。因此，摒弃这些理论之前，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理论所做出的假设，因为这会影响我们将如何使用它们。例如，或许，苏联解体后，过渡时期的情境，改变了基于群体技能和向上流动性的预期收益计算，不再像霍洛维茨 (Horowitz)、罗戈夫斯基 (Rogowski) 和莱廷 (Laitin) 描述的那样。或者也许，在这儿没有得到支持的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族群的行为，但不能解释研究者所关注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研究中得到有力支持的理论应该在其他情境下继续被检验，而这个过程会提高我们理解分离主义行为的能力。

¹ 原来爱沙尼亚 (它是计算因变量的一个起点) 对于时间依赖的评估有无足轻重的影响，表明任何开创性的影响都是不重要的。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